

朱喬初

中國史學通論

21613



獨立出版社印行

目次

| | |
|---------|---|
| 自序····· | 一 |
|---------|---|

| | |
|--------------|---|
| 中國史學之起源····· | 一 |
|--------------|---|

| | |
|--------------|---|
| 一、史字之本體····· | 一 |
|--------------|---|

| | |
|-------------------|---|
| 二、有文字而後有記載之史····· | 二 |
|-------------------|---|

| | |
|----------------|---|
| 三、再論書記官之史····· | 五 |
|----------------|---|

| | |
|------------------|---|
| 四、未有文字以前之紀載····· | 七 |
|------------------|---|

| | |
|-----------------|---|
| 五、再論追記偽託之史····· | 四 |
|-----------------|---|

| | |
|----------------|---|
| 六、論歷史之萌芽上····· | 七 |
|----------------|---|

| | |
|---------------|---|
| 七、歷史之萌芽下····· | 一 |
|---------------|---|

| | |
|--------------|---|
| 中國史學之派別····· | 三 |
|--------------|---|

中國史學通論

| | |
|-----------|----|
| 一、編年史 | 三六 |
| 二、國別史 | 四〇 |
| 三、傳記 | 四四 |
| 四、政治史與文化史 | 四九 |
| 五、正史 | 六九 |
| 六、紀事本末 | 七八 |
| 附錄 | 八三 |
| 一、太史公解 | 八三 |
| 二、漢十二世著紀考 | 八五 |



序


中國史學通論，原名中國史學概論，蓋敘述中國各種史體發展之大概，而略論其利弊者也，故謂之通論亦可。此書本爲國立北京大學史學系講稿，編於民國八九年間，既爲急就之章，故無精深之見，雖皆自出心裁，不染抄胥陋習，（抄胥有二，一就中國名著類例抄襲；一就外國名著片段抄譯，乾沒其名，據爲己有）然講義之作，究不足以言著述，故置之篋衍，已二十餘年，等於拒諸衽席。近因女婿羅君香林向在清華大學曾聽講此書，請以付梓，以便溫故而知新。且謂此書較正史通鑑十條，均爲精深之論。而尤以分書記官之史與歷史官之史，性質不同，破數千年歷史官翹於黃帝之舊說，爲前人所未發見。又以科學方法治史，視人類之發展，與動植物之發展相同，科學不以低等動物與高等動物有所軒輊，有所愛惡，雖單細胞動物，亦以全力研究之，治史者以所愛者軒之，所惡者輕之，全以愛惡用事，而無名正之心，則諱飾與蔑棄多矣。世界安有史哉，此我國別史

籍，論史家自正統信之成見，而蒐集國內外之史料多矣，此亦足破千古之謬見，為史學家應自位置，不為政治家之僕隸，方足以釋史職。他如今後之史學，不應專重國史，而須提倡民史，蓋國史決不能發露真情也。凡此諸端，已足矯正舊史鉅弊，可以全變史風。現此書又隨意寫，珍貴如珠玉，錯繆不絕稿。余以香林之言，不無所見，允其訂梓，然此書謬誤脫略之處何多，終非完書，擬稍稽昨日，略加修改。香林曰，世界無完書，以孔子之史學，今日議其非者多矣，以康德之哲學，今日議其非者亦多矣，然終有不可磨滅者在，不如仍厚待之耳，以表後日之遺誦如此。余曰善，因錄次其言而為之序。並以舊作太史公曆及漢十二世著紀考二篇為附錄。以其與此書有關，可以補其之不足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朱希祖作於重慶歌樂山寓廬

一 中國史學之起源

一 史字之本誼

欲明中國史學之起源，須先明史字之本誼。說文解字云，「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其字古文篆文並作篆。案記事者，卽後世之書記官，此爲本誼。歷史官之史，乃引申誼。蓋又，爲古右字，篆文作，與右手形。中，爲朋字。右手持冊，正爲書記官之職。蓋古文謂作冊，篆文作冊，增作手，後世誤認爲中正之中，其實中正爲無形之物，不可手持，許君之說非是。中爲簡冊，兼似六書故，吳大澂說文古簡冊，已有此說，然其說尙未密。江永周禮疑義舉要，吾師章太炎先生文始，引證更確實。杜氏云：「凡官府簿籍謂之中，故諡官書治中受中，小司寇既庶民獄訟之中，皆謂簿書，猶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義，故說文得省謂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只行又爲也。史字事字，

皆有中字。天有司中星，後世有治中官，皆取此義。韋先生云：「周从卜中，中字作𠂔，乃橢圓形。古文用作𠂔，則中可作𠂔，用二𠂔，此三𠂔也。其作中者，非初文，而爲後世之字。中本册之類，故春官天府『凡官府鄧州及鄧鄙之治中，受而箴之』。鄭司農云：『治中，謂其治職審詳之要』，秋官司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歲終則合羣士辨獄解訟，登中于天府』。記禮器曰：『因名山升中于天』。升中，卽登中，謂獻民數政要之籍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謂操圖籍也。春秋國語曰：『余右執殳宮，左執鬼中』。韋解以中爲良翰。漢官亦有治中，猶主簿耳。史字从中，謂簿記書也；自大史內史以至府史皆史也」。

魏王列諸設，則以右手持躬之記事者，卽記事之書記官更明矣。（海寧王國維作釋史一篇，取日本飯島忠夫說，以中爲周官大史職所云『飾中舍筭』之中，爲筭策之器。案此爲周制，初創字時，未有此器，故不從其說。史之本職僅爲記事，層數屬史，皆爲後起，此從其說。）

一一 有文字而後有記載之史

說文序云：「黃帝之史倉頡，初造書契」，尋引君此說，出於世本。世本今亡，廣韻九魚韻下引世本云：「沮誦倉頡作書，並黃帝時史官」。倉頡作書，古書有傳述者多，可無疑義，如荀子解蔽篇云：「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韓非子五蠹篇云：「古者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倉頡固以知之矣」。「私當作人，私爲假字」。呂氏春秋君守篇云「倉頡造書」，惟稱倉頡爲黃帝史官，異說紛歧，足證疑難。森傳采衆說，折中一是，亦研究史學發生之一要義也。

倉頡時代，說者不同。尙書序孔穎達正義曰：「世本云，『倉頡作書』，司馬遷班固章譌宋忠傳文皆云『倉頡，黃帝之史官也』」。(一)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二)徐整云「在神農黃帝之間」。(三)陸周云「在炎帝之世」。(四)荀氏云，「當在庖犧黃帝之世」。(五)嶺到云，「在庖犧之前」。(六)張揖云，「倉頡爲

帝王，生于虞夏之紀。(七七)張揖之說，出於廣雅。廣雅云「自開闢至堯舜，二百六十七萬歲。分爲十紀，則大率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十紀者，九頭一，五苗二，攝提三，合轍四，連題五，序命六，循養七，因提八，禮運九，流訖十」。據廣雅所說。則倉頡之生，在堯舜前二十七萬六千年餘。其說怪誕，出於緯書，不足指信。崔瑗等說，但云古之王而不盲時代。亦不足辨。衛氏言在庖犧者帝之世，則在庖犧後，與列若懷子，云在庖犧前。他若徐邈述周之說，與司馬遷等說。不相舛謬，蓋一則言其生在黃帝以前，一則言其官在黃帝之世也。

綜上七說，惟稱司馬遷等說，有辨論之價值。司馬遷等說與許慎說同出於世本。世本與懷子皆出于戰國時，其說均古。二說孰是，則又須攷定造字之年代以斷定之矣。

易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隸文序云，「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爲萌生。黃帝之

史倉頡，見易歟。隱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野
蒼斷定庖犧至神農時，皆爲結繩而治，庖犧作八卦，垂憲章，始刻畫卦爻，爲造字之先導；
至黃帝時，乃造書契，並刻畫之能事，次序井然，合乎進化之理。司馬遷作史記，本
紀起於黃帝。而世寶傳又云，『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己。』蓋亦以有文字而後有史，故
起黃帝。』神農以前爲結繩之世，故不可知。『韓司馬遷計慎之說，皆本於莊子。莊子
『騁倕云，『昔者黃帝成，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梁氏臞氏軒轅氏（案黃帝亦稱軒轅氏，
此軒轅氏在黃帝前。）赫胥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結繩爲
記事之發端，亦易之樞與，指其法式今已不傳。然觀外國記載，謂『中國以外薩民族亦
往往行之。』往昔西藏及貴州之苗族，亦有結繩之事，而琉球近時，尙有其制，海南土人，
亦有用之者。當西班牙之侵入呂宋也，其國有通行之克浪斯 Quipus 者，爲一種最發達
之結繩法。德國人對於結繩一事，考察詳切，著有專書，結繩法式，皆有圖說。『吾國古
法，亦可由此推測。此法行於簡單社會，固可適用，至於商業繁盛，則飾爲助生，非有

文字，固不足以濟其窮。神農以前，既爲結繩之世，則始造文字，必在黃帝時無疑。苟在黃帝之時，則倉頡爲帝王之說，不攻自破。且倉頡爲帝王，蓋由史皇而附會。淮南子本經訓云，「倉頡作書。」修務訓云，「史皇產而能書。」高誘注云「史皇，倉頡。生而見鳥跡，知著書，故曰史皇，或曰顓臾。」慎到謂「倉頡在庖犧前」，係古文尙書序謂「伏羲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其說皆非。尙書正義所引七說，惟第一說爲足存矣。

三 再論書記官之史

上言文字起於黃帝，則黃帝以前，既爲結繩之世，文字未生，倉頡何由得爲黃帝史官？曰：結繩以記事，則結繩之記事者，亦得追稱爲史官。惟此史官，爲書記官，非歷史官。漢書藝文志，不可混淆。或謂說文序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謂之字。」其後云者，似指倉頡之後，史字从又从中，爲相益之字，倉頡時似未有史字，何得稱爲史官？曰，伏羲既施震卦，即施賁卦，（王弼說）倉頡

既能造文，即能爲文。韓非子云，「倉頡作字，背公爲公。」公從八（八有背隨）從人（私之本字。）安見倉頡時無史字乎？假使未造史字，後世亦得追稱。

書記官稱史，不盡上古如此。周官太宰「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十二人。」注曰，「史不書者。」其他各職皆有府史胥徒。大宰又有「女史八人。」注曰，「女史，女奴曉書者。」宰夫「史，掌官書以贊治。」注曰「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周官之五史，（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大氏皆爲掌管冊籍起文書草之人，無爲歷史官者，惟五史如後世之祕書及秘書長，爲高等之書記；（說詳後）府史之史，則爲下級書記耳。說文序云，漢興，尉律。「學僮十七以上，能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郡移大史並課，最者以爲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漢書百官公卿表縣令長有佐史。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等官，皆有長史，續漢書百官志，自三公以下至郡國縣道，各有掾史；（分掾屬與令史。令史各典曹文書。郡國縣道，又有書佐。）三公亦有長史，又有記室令史。案佐史掾史之史，皆書記官，即尉律所課者；長

史，卽後世之祕寶長。記室令史，則祕寶也。

歷史之作，必起於圖書蒼萃之地。古者圖書蒼萃之區，必首推太史，呂氏春秋先驗篇云，「夏太史終古，殺其閭法奔商，商內史（案疑太史之誤）向鮒，殺其閭法奔周，晉太史屠黍，亦以其閭法歸周」。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其屬小史掌邦國之志。左昭二年傳，晉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司馬遷自敘，「漢興，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故歷史之記載，必萌芽於太史。然其初之所作，僅記述一時一代之政典禮儀，與夫辨世系及昭穆而已。如尙書儀禮周官禮疏等皆是。凡此記載，正名定分，僅足稱爲史料，未足僭名歷史，蓋因果之關係，時間之觀念，爲歷史最粗淺之條件，且尙未明也。

歷史之法，必爲治歷明時者所頒。周宣太史，正朔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郡縣。『續漢書百官志太史令，掌天時星曆。凡歲終，奏新年曆，』西周以前，未有編年之史，至西周之末，始有春秋（說詳後）春秋之作必起於太史，觀魯之春秋藏在太史，卽可知

之。至後太史能以時明之觀念，發明事實之因果，於是乎有題年之史，足以附脈史之名。至孔子修春秋，魯太史左邱明即爲春秋傳，厥後司馬遷爲漢大史，亦成史記。惟歷史之作，向爲爲太史者私人所發明，未必爲太史之事職。觀夫漢之太史，至後漢時尙專掌星曆，秦時節祭忌，訃殯應災異而已。（史通史官篇云，司馬遷既歿，後之載史記者。若荀先生劉向馮商揚雄之徒，並以明職。來知史務。於是太史之署，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單璽王立高堂隆等，其言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而著作歷史者，反在蘭臺東觀。班固爲蘭臺令史撰漢書，李尤召詣東觀拜蘭臺令史，撰漢記。夫蘭臺東觀。爲蘭臺秘書之所，令史專奏及印工文書，蓋後漢之時，尙無歷史官專職也，至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禁中書。晉元康初，改祿祕書，改掌史任。梁陳二代，又置撰史學士。歷史官之有專職，蓋始乎此。由此觀之，西周以前，無成家之歷史，魏晉以前，無歷史之專官，可斷言也。（史通史官篇云，「史官之作，肇自周室，備於周室」此與書記官爲歷史官矣。漢晉藝文志云「道家著述，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証，然後知秉要執本。」案道家伊尹太

公管仲皆非史官；惟老子爲柱下史，或云爲守藏室史，柱下爲款密之地，老子實猶今圖書館長，或圖書館書記耳，未嘗作歷史官也。後世誤以道家者流，出於歷史官，於是學術源流因而淆亂。此余所以斤斤致辨於書記官與歷史官之分別也。

四 未有文字以前之紀載

或謂倉頡造字，在庖犧前，慎到之說，未可厚非。蓋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三皇中有庖犧，庖犧既有書，則造字者必在庖犧前可知。况庖犧有習辨之曲（楚辭大招篇及通鑑注。）有網罟之歌（隋書音樂志又見夏侯玄辨樂論。）而十言之教。至今尚存。（左定四年傳正義引易）他若葛庖天之歌八闕，（呂氏春秋古樂篇引。）神農之書，數十篇（漢書藝文志農家，有神農二十篇，兵陰陽家，有神農兵法一篇，五行家，有神農火由五行二十七卷，雜占家，有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經方家有神農黃帝食禁七卷，神農家，有神農雜子技道二十三卷，本草一經，雖不見於隋文，而漢書小帝紀援載傳，亦嘗稱述。）

事證如此，何以言黃帝以前無文字乎？

曰，黃帝以前舊籍，或出追記，或出偽託，賈公彥周官外史疏引李經緯云，『三皇無書』申之云，『此云三皇之書者，以有文字之後，仰錄三皇時事。』此所謂追記也。漢魏以後追記遠古之事，其書彌多（如徐璆三五歷言盤古之事，項峻始學篇言天皇地皇人皇等事，皆漢以前書所未道。）皆屬此類，漢書藝文志農家門下二十篇，原注云，『六國時諸子疾時意於農事，託之神農。』藝文志所載黃帝時書，且多依託，何論遠古？淮南子云，『世俗尊古而賤今，特託黃農以爲重。』此皆所謂偽託也。黃帝以前之書，皆可以此二例觀之（嚴格言之，堯舜以前之書，皆可以此二例觀之。蓋勿造書契，施於實用，未必卽有著作記載等事，是實法傳也。）

或又謂管子封禪篇云，『管子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以詔者，十有二焉。』所謂十二家者，無復以義神農炎帝黃帝顓頊帝堯舜禹湯周成王。而許慎說文云，『黃帝之史倉頡始造書契，以迄乎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

代、原有同焉。』由此觀之，七十二代之中，已有無幾處。○（卽鹿嶺處或作密作伏，皆楚簡。）許君云，『七十二代之字體，雖有不同焉。』○四槐到食顧造字在鹿嶺前，蓋信而有微矣。左昭十二年傳云，『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與八索九邱。』韋太叔先生曰，『封於泰山者，錢槐，義神農時之三墳，炎帝黃帝顓頊帝禹堯舜禹湯周風王，謂之九邱。蓋河石勒功，此懷秦岳，故名墳邱也，五墳爲五帝之典；八索爲三皇五帝之書。此書皆刻，蓋不相同。然同爲簡編，故名典索也。』然則刻石有三墳之文，簡編有三皇之書，貞信可確，何云黃帝以前之書皆出是記偽託乎？曰，管子封禪篇其書早亡。今本管子有封禪篇，唐房玄齡注管子詩，采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之言以補之者。觀篇中所云，蓋秦始漢武時假託管仲之言以諫行封禪者所爲，未必出於管子。即使出於管子，管子一書，亦係後人偽託。卽非偽託，封禪篇言，『管仲臨桓公不可窮以辭，因段之以事，曰古之封禪』云云。則前說之七十二家十二家，後說之五物十五物，皆係假設之辭以欺抵桓公者。封禪篇之不足信一矣。○（梁書許懋博懸鐘殿行封禪，以封禪爲緯世之圖說，與此篇相發明，可參考焉。）

封禪篇言「封禪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記十有二」。此蓋假說之辭，或係傳聞之語，未嘗易七十二代之字跡詳其同也。前君文序所言，全與管子不相合，（管子僅言自己所記，未嘗言及刻石字體，管子所云七十二家，上起無懷，前君所云七十二代上起黃帝，此或前君一時誤記，或別有所據）。并爲一統、二矣。尙言孔丘正史引韓詩外傳云，「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禹、湯、伊尹、周，不能盡識」。史記封禪書正義引韓詩外傳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孔丘王，可得而記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餘人」。今本韓詩外傳已逸此文。此蓋傳聞之語，韓詩外傳以之孔子；司馬遷作封禪書，則竊之管仲。此皆古有其語，後人追記；而得聞其言，只和遺失三矣。三說既明，則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諸解，如尙書偽孔傳序，及賈逵（見左昭十二年傳正義）。鄭玄（見周官外史注）。下至章先生之所主張，其是非皆不足辨矣。（周官外史宗人注云）。「九皇六十四民」。疏云：「按史記伏犧以前，九皇六十四民，並是上古有名號之者」小宗伯疏又引史記云：「九皇氏沒六十四民氏；六十四民氏三皇氏」。通鑑外紀引史記作「六十四氏」。案司馬遷

史記趙世家，其所引足下如何，詞語含糊，一讀難明，吾不知己。今其篇目說，不必待疑。若不信，則十有九合之三百五帝，正合管子七十二家之說，管子自稱吾所記十有二，此書之首，豈可以符管子之說乎？如此則言，則界史中，正不難連續行跡矣。

五 再論追記僞託之史

御書錄云：「孔子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追於黃帝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隨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一十篇爲傳書，十八篇爲中候」。（御書序正義引鄭氏書說所引）。由此，則孔子所見帝魁以來之書，尙有三千一百二十篇，此孔、孟之說所由來也，自來言孔子刪詩書者其說皆不足信，（刪詩之說，出司馬遷史記，駁語見下）。大戴禮宰子問正帝德，孔子曰：「黃帝曰：『先王之言』」。故孔子輯書，肇自堯舜，黃帝紀瑣帝舜之書，孔子時已不得見，非刪之也。（孔子不見黃帝紀瑣帝舜之書，而于帝德篇述

其傳；猶孟子不見周初典籍，而述周初傳勝之詞，蓋皆得諸傳聞耳。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列子楊朱篇）。蓋皆無實足徵也。孔子輯書有旨，而《書緯》言輯書百二篇。尋同書曰兩篇，係漢張霸所偽造。（見讀書儒林傳）此《書緯》益出於漢代，可斷言也。

緯侯門譏之書，多託之孔子。其中敘述古史，神奇怪誕，頗動聽聞。諸經述史之士，或多採摭，以亂其真；故其源流不可不辨也。隋書經籍志云：「說者又云，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損，以廣其意；又有七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并附合爲八十一篇」。文心雕龍正緯篇云：「八十一篇，皆託之孔子，通儒訂毀，謂起哀平」。（案漢張衡上疏云，「成哀之後，乃始聞之」。荀悅中經謂「起於中興之前」。徐衆原著緯侯不起於哀平辨周書「緯書當起於西京之季，而閭閻却有古有之。史記趙世家「扁鵲言秦穆公篇而述上帶

之言，公孫支書而述之，在戰國是出矣。『太史公』『漢人』所生使入『漢』，以免神訛，因『秦錄』同書。『太史公』之名，實出於此。『太史公』之書，與『經』初不相涉；至後人漸作『經』書，則因『周禮』而卒合於『經』。『周禮』二說，後說較是。『周禮』說經，其體迥然；約而言之，惟『周禮』二經而已。『周禮』自別行，如孔老說。老子『河洛』說，尹公競，倒向『經』，『經』（見『周禮』經籍志）等皆是。信者較寡。『經』者，所以配，故自六經論本經而外，『經』復別出；『河洛』書等經，皆屬於『易』。漢書李尋傳已有五經六經之文，說者又以莊子所說十二經以當六經六緯，（莊子『天道篇』云，『孔子西遊』於周室。『經』十二經以說老聃。案此所云十二經，殆指春秋十二公之經耳。）故『經』者多信之。自宋大明中，始疑『周禮』，遂入『監』中，又重其間；『周禮』受禪，禁之愈切；周帝即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經』緯相涉者，皆焚之，自是識多亡；而『緯』則以偽書傳述，不作邊城，附『經』書於成於唐，所載僅有『緯』書，而說則僅云『梁有而已』。今世所傳古『經』書，及七緯諸書，皆『緯』之僅存者。蓋自漢以來，漸歛集錄以通經；『周禮』雖以定禮；『周禮』公心，又難以據史。於是司馬貞之補三皇本紀，

馬遷之撰釋史，皆紛紛僅緯，以相傳述，延及海外，則又據春秋緯十紀之說，（見上）以附會巴比倫歷史，謂爲漢和西來之證，騁相流傳，蓋非一日。夫此僞託之書，神話之籍，其不足以當信史，稍有識者，當能辨之矣。

六 論歷史之萌芽上

上敘章、書、史官之史，與歷史官之史，性質不同；與夫一事之記述，一時之典章，皆爲史料，而非歷史；且辨明未有文字以前及既有文字以後一切追憶僞託之作，以清史學之源，言之頗極詳盡。惟言成家之史，如春秋歷史之官，趨於魏晉，此蓋稍有疑義，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鄭司農云，「志，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外史，掌四方之志。」鄭玄云，「志，記也。國語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檇杌。」魯春秋晉乘楚檇杌周志鄭書，既已可稱爲歷史；則小史之史，得非爲歷史官乎？曰周官五史，皆爲後世史官之屬，非爲歷史官，而既言之矣，二鄭之註周官，皆以春秋戰國時之史

乘，僅將西周初年之制度，所謂以後世前，不足爲訓。且所謂掌者，祇司收藏，非著作之權。尋明官制文，「小史，掌邦國之」，莫繫世，綴昭穆。」所謂邦國之志，卽志所莫之繁世，所辨之昭穆，卽邦國之昭穆類也。若依先鄭所註，指爲周志鄭書，則與外史所掌四方之志，正稱代魯秋晉乘楚檮杌有何區別？又「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此所謂志與書，皆記也，卽記所書之號令。漢書藝文志云。「書者，古之號令」。三皇五帝之書，如伏羲之教，（見左定四年傳正義）。神農之教，（見漢書食貨志）神農之教：（見華書治要六韜虎符篇）。黃帝顓頊帝舜堯舜之政語，（見賈誼新書修政語）庶幾近之。四方之志，卽班於四方之政令。若方志之書，在周官必誦訓（掌道方志）訓方（誦四方之傳道）所掌，漢書藝文志入於小說家者是也。後鄭所釋皆非。總之小史外史所掌，皆保證縣政令之屬，可爲史料，未成歷史，斷非魯春秋等所可比擬也。

徐國歷史家即柏雷希脫 *Herodotus* 著近代歷史學以爲一歷史之善端，有兩元之傾向，皆由個人之記憶，而對於祖先尤爲關切。兩元者何？卽所謂自然主義與理想主義是

也。取自然主義形式者，其初爲世系，取理想主義形式者，最初爲英雄詩。」按充吾之歷史之發端，亦不外此例。然則小史所載與世辭昭穆之譜牒，及春秋以前頗美祖先之詩，皆吾國歷史之萌芽也。

史記三代世表「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尙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又曰，「余讀牒，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十二諸侯年表「太史公讀春秋左傳牒」又曰「譜牒獨記世世，其辭略。秋一觀譜要，雖」由比觀之，體牒文體，略而不詳。司馬遷之所見，今雖不傳，然極諱之者均云，「史記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放周譜，」大戴記所載之帝繫，漢書藝文志所稱之世本，皆譜牒之遺式也。司馬遷云。「唐人取其年月，譜牒獨記世世」。（見十二諸侯年表序）然則譜牒所重，在記世系名姓，三代世表，即其例也；年月異同之爭，獨在於曆人，觀漢書之譜志，可知。又唐藝文志「黃帝以來曆三十三卷，鄒垣一十一卷，甄瓊五星曆十四卷，夏殷月令一十一卷，此所謂「也，」元般周曆，十卷，以爲譜牒也。帝王

諸侯世譜二卷，古來帝王年譜而卷，此所謂譜也。此等書籍，未必即爲司馬遷所藏之曆譜，然其性質，亦不外是。蓋古人記載，所重世繼，而因果之關係未明，時代之觀念亦淺，記載年月之法，初始附而不詳，故春秋以前，年代不明。雖古人亦多爭執異同，此譜系之所以不能稱爲歷史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明詩所以載王者之迹也。春秋以前，吳武之事，大抵皆攝之既時。虞夏之詩，尙矣，不可得而見，詩之雅頌，初載商周。如商頌之長發（有伐韋伐觀伐昆夷伐桀之事），殷武（有伐荆楚謂易所謂高宗伐鬼方）。大雅之生民（遼后稷家有部）公劉（述自邠遷那事）。賢（述自那遷岐事，且載昆夷陷陸與芮觀成事）。皇矣（述太王季事，且有伐密伐豳及伐阮徂共事）。大明（述大任大姒事，且載尙父助武王伐紂牧野事）。文王有聲（述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事）。小雅之采芣出車執事（述文王北伐獯狁采薇以遺將帥，出車以勞還。狀杜以勸歸）、六月（宣王北伐，述吉甫伐玁狁）。采芣（宣王南征，述方叔伐玁狁）大雅之崑崙（述申伯式南邦）。卷民（述仲山甫式百辟）。韓

奔（遼韓侯伯北國）。江逸（遼石虎平淮夷）。常武（述南仲擊六師，喪南國。程伯休父陳師旅，省徐土）。此皆歐人所謂英雄詩，本於個人記憶，而於祖先尤爲關切者也。

七 歷史之萌芽下

卽泊雷希脫又云，「譜系進而爲年代記；（吾國稱爲編年史。）英雄詩進而爲紀傳」。此兩元之進化。其說固是；然以吾國史徵觀之，則四者發生之次第，詩最先，紀其次之，譜系又次之，年代紀最後。茲分述之，（吾國譜系，雖至周代始發達；然周以前祖祿脫略之譜系式記載，亦必有之，故與兩元進化說仍不相戾）。

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故有言志之詩，而後有永言之歌（歌者歌其詩也，此爲徒歌）。有永言之歌，而後有依永之聲；有依永之聲。而後有和聲之律，有和聲之律，而後有樂器之作，以興徒歌相和。自伏羲作琴，女媧作笙簧，已有幾歌，所歌者卽譜之詩。其詩而後世之歌謠，播於口耳，不著文字，故易遺漏失傳。然則詩歌元

文字面有，鄭玄謂「時之興焉，諒不於上皇之世」，（見詩譜序）其說非矣。詩雖起於上古，然商周以前，其詩已不傳，而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五篇」。《見孔子世家》此孔子刪詩之說所由本也。然紀左氏春秋傳魯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季札聘魯，請觀周樂，所歌之詩，不越十五國風二雅三頌，孔子之生，在襄公二十二年，當季札觀樂，纔七八歲耳。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明周樂在魯，祇有此數，非爲孔子所刪定。所謂得所者，蓋編定其篇第，傳述其事義云耳。其時六代之樂，及夏之九歌九辨，蓋已亡佚，即商之名頌十二，猶亡其七，他可知也。然則揚武功，述祖德，若雅頌之詩，必起自古初。（呂氏春秋古樂篇，所引古歌之名，證係傳述，亦是徵）。特至孔子時，已澌滅不傳耳。

紀傳之名，始於禹本紀（見史記大宛列傳）。及伯夷叔齊傳。（見史記伯夷列傳，或謂世有魏文侯斯傳亦在史記前。尚書傳春秋傳不在此例）。莊周上之，堯典皋陶謨，雖

無紀傳之名，已有紀傳之實。堯典一篇，首尾百七十歲，（堯在位七十歲。舜啟用三十歲，在位五十歲）。與紀載一姓之治迥異，實爲不紀之權輿，若以司馬遷之本紀相較，則堯典所缺，僅年月之不聞耳。若史學上時間之觀念尚未明也。皋陶謨但以「粵若稽古皋陶肇端，中間雖載皋陶尚在帝舜前相陳之屬言，而又敘述帝舜與禹皋陶舜之語，而隱以帝與皋陶相和之歌，蓋重在皋陶，故曰皋陶謨，柯爲敘紀之體，與尚書中諸篇命之文迥別，實爲列傳之權輿，與史記屈臣賈誼司馬相如等列傳不載事功階級，諸文章者相契，所不同者，惟不登皋陶爲何地人耳，此史學上空閒之觀念尚未明也，司馬遷之紀傳，在年代記發生之後，史學已達進步之時，堯典皋陶謨乃續其詩而起，史學尙屬幼稚，祇能述其部，不能觀其全體，與詩之敘述相似，試觀堯典自「欽明文思安安」，至「黎民於變時雍」，以四十八字，概括堯之生平，似商周之牒頭，似後世之銘贊，皋陶敘述末，竊以歌詩作結，蓋未脫吳騷詩之習也。堯典皋陶謨等書，今文家謂爲孔子所作。此蓋臆說之辭，不足措信。左文十八年傳，季文子已引虞書「慎徽五典」等文，（今見歸典）左傳二十七年傳，晉稱趙襄

卻說殷禮樂樂而敦詩書；又引夏書「賦納以言」等文。（今見皋陶讓佅若左文七年傳卻缺引夏書左莊八年傳莊公引夏書，左昭十四年傳叔向引夏書，周語內史過引夏書，周語單穆公引夏書，諸如此類，或只今存，或爲逸文，不勝枚舉）。則孔子以前，已有人引虞夏書矣。左哀十八年傳孔子兩引夏書，則孔子亦引夏書矣。謂爲孔子作，夫豈其然。然如段玉裁說，以堯典爲夏史所作，據堯典「舜陟方乃九」爲證；孫星衍又以皋陶謨爲虞史伯夷所述，據司馬遷說皋陶謨，及大戴記誥志篇虞史伯夷釋「幽明」爲證；則又不明虞夏之時，無歷史官，且虞夏史步幾皋陶尙近，何以篇言皆云，「粵若稽古」？以意揆之，則典謨之作：殆出於夏商之際或西周以前乎？（英雄詩進而爲紀傳，堯典皋陶謨前英雄詩必已發達無疑。然紀傳既興而英雄詩仍未絕，如漢以後郊廟歌詩是也，此殆年代既興而譜系仍未絕：如漢以後所出譜牒是也）

譜系起於何代，不可得攷，述其初起，不過如小史所掌翼繫世辨昭穆而已；年代事蹟，必不詳也。司馬遷謂（譜牒獨記世監，其辭略）。又謂「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

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則譜系殆弱於周乎，庶幾傳登，夏初傳子，其譜時系有無，蓋不可考，有殷一代，兄弟弟及者多，至於周代，主於立嫡。姬歌大宗小宗之辨，故其世系辨昭穆，其要事也。此證一也。史記三代世表，出於世本，法效周譜，然云從黃帝至夏桀二千世，在禹至桀十七世。從黃帝至殷湯十七世，從黃帝至紂四十六世，從湯至紂二十九世。從黃帝至周武王十九世。尋世表云。「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漢晉律曆志則云「顓頊五代而生鯀」。世表從夏禹至桀十七王，中有傳弟者四，至桀實十二世，（按世表例，末王不數，下放此），則黃帝至桀實十六世；若依漢志，須加三世，則十九世也，一疑矣。世表云，「帝小甲，太庚弟」。殷本紀則云，「小甲，太庚子」。索隱引世本同。世表，從黃帝至殷湯十七世，從湯至紂二十九王，中有傳弟者十四，至紂實十五世，則黃帝至紂實三十二世；若依世本及殷本紀，須加一世，則三十三世也，二疑矣。據世表黃帝至紂十七世，黃帝至紂三十二世，而黃帝至周武王僅十九世，武王與紂並世，何殷周世系相差如是其遠乎，三疑矣。由此觀之，周以前歸系，皆由周人追錄，知則尋

之，不知則問：自周以下，不待王室世系，非然不紊，卽殷侯之諱，亦辭哉而靡道，此二證也。周代宗諸系之官，在王室則有小史，在侯侯則有史之闕大夫；周以前未聞有此官制。此三證也。史通表傳篇云，「禮之建名，起於周代」。蓋分同於周也。（梁玉繩史記志疑攷證祭法起引春秋命歷序云，「黃帝傳十世，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二十世，帝堯傳十世。以歷史記三代世表。禘祫之之不足信，已如上論。然漢王符潛夫論五德志則「堯爲伏羲叔，堯爲神農後，舜爲黃帝後，禹爲少昊後，湯爲顓頊後，皆不同祖」。而司馬遷亦辨五帝非一族。亦是見周以前諸系皆係追述，不足信也。

春秋以前，無紀年之史。似乎何公之文，年月間，稱王稱公，非序莫辨，甘誓一節，禹啓太康，說者非一，莫能證明，大誓上「紂元於文王」，命賁以管克商二年，隨文訊說，不以一王歷祚爲統，此年不繫於時王也。序言昔者惟三月後生魄，召詰，書惟二月既望，知有月日而不知事在何年，此月不繫年也。召詰「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戊辰，王在新邑」，知有日時，而不「事在何年」，此日不繫於月也。史法草草。明成周故無春秋

以日繫月，以月繫日，以日繫年之術也。（周初不始繫年於事，即記日亦繫於事。如召誥「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內午，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以下越三日越五日若翌日越三日越七日等句，皆不以日繫月而繫於事。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禋，甲子，王乃徯獵於越，乙丑，王崩」。四月不繫月朔之日子，則甲子乙丑，亦不知在四月何日，則亦以日繫事而已」。成周春秋以前，既無編年之史，何以司馬遷謂「余竊感黃帝以來，皆有年數」乎？曰，黃帝至周世以，其傳聞互異，越百年數，漢書律曆志云，「太史公服賡王及穆王，治黃帝閏曆，言黃帝至元鳳三年，六千餘歲。丞相封實長安單安門安邸，栢宮治終始，言黃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李軌注法言云，「世有黃帝之書，論終始之運，當孝文之時，三千五百歲，天地一周也」。《見重黎篇》）司馬遷所以謂「稽其曆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也。史記自共和以前立世表，共和以後始立年表；蓋亦以共和之世乃始有百年之史也。成周晉代汲冢發魏襄王家，得紀年，託始黃帝，至春秋以前，皆有年數可稽。此書前人定爲戰國時魏人所

記。而漢書律曆志載歷故三統曆，唐虞夏商，皆以紀年，自周初至共和乃用魯曆，時周室已亡。則共和以前自有年代可稽，何以謂初年史始於春秋乎？曰：竹書紀年蓋晉東晉等所偽造，本不足信。今本竹書紀年，又宋以後人所偽造，偽中之偽，更不足信。劉歆三統曆由於推測，與春秋王單安同等，蓋以以災，亦不能爲和證。紀年云，夏紀年四百七十一年：「三統曆則云四百三十二歲」。紀年云，「將總年四百九十六年」，三統曆則云「六百二十九歲」。紀年云「自武王滅殷至幽王二百八十一年」，（史記周本紀、解引汲冢紀年云，「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此足證今本竹書紀年，非晉代原本明甚。）三統曆則云「伯禽至春秋三百八十六年」。二家之說相歧既如彼。劉歆據魯春秋以前至伯禽初封，三百八十六年，（而史記魯世家自伯禽初封至惠公末，得三百二十一年，（史記封禪書云，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三統曆「成王元年，命伯禽侯於魯」。魯世家「孝公二十五年，大貳殺幽王」據此，以魯世家推算武王滅殷至幽王不凡二百七十五年。三統曆云，武王克商後七歲崩。按三統曆推算武王滅殷，至孝公二十五年，幽王

統數，凡三百四十五年。與紀年說均異。）魯曆與魯世家相異又如此。足見春秋以前，無編年之史，各系所記之年，皆由推算而得，非真出於信史也。然則編年之史始於春秋，有說乎？曰春秋之作，蓋在共和宣王之後，故司馬遷年表始於共和，墨子引諸內春秋，亦上逮宣王而止。（墨子明鬼篇引周春秋言宣王杜伯事，又引莊春秋宋春秋齊春秋，皆言春秋時事。左昭二年傳有魯春秋，其後孔子修春秋，蓋即據此。管語羊舌肸習於春秋，楚昭王使士聲傳太子，申叔時告之曰：「敎之春秋，孟子謂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蓋當時編年紀事之書列言之則曰乘曰檮杌，總言之，則皆名春秋，史通六家篇論書李德林傳並引墨子云，「吾見百國春秋」。蓋當時各國皆有編年之記載。故自共和以後，各國諸侯始有年數可稽也，總之春秋之名，共和以前，未聞有此，而史記云「汲冢璣璣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此又足徵其偽矣。）孔子修春秋，託始魯隱，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時者、春夏秋冬也。當時有周正夏正之不同，故時頗重）。春秋之名蓋卽約舉四時之春秋也。）以時繫年，自是厥後，時間之觀念明，因果之關係著，歷史最

條件，於是乎始立矣。

中國史學之派別

史學上有兩大派別焉：一曰記述主義，一曰推理主義。而此兩大主義必俟時間（年代）空間（地方）之觀念明確，然後能發達進步。吾國自周共和以後，始有春秋，既以年代相次，又以地方區別。然吾人今日所見，惟有孔子所修之春秋其未修之各國春秋，如魯春秋齊春秋等皆已亡滅，其體例若何，不可論列；故其主義若何，亦不可斷斷，然大概不外乎記述主義而已。——前章言史學之發端，有兩元之傾向，卽自然主義與理想主義是也，自然主義發端爲譜系，其進步爲年代記，理想主義發端爲氏族譜系，其進步爲紀傳。此兩主義皆包於記述主義之中。理想主義漸次進步，卽，推理主義——自孔子修春秋，一再相傳，於是記述主義與推理主義兩派始並立。記述主義爲左氏春秋傳，推理主義爲公羊春秋傳敘梁丘秋傳，其後記述主義，大形發展，而推理主義，則自漢以後，漸次衰微焉，蓋記述與推理兩主義，其發展之難易，各不相同。記述主義所憑藉，於史料精研別擇之外，有言詒

事，（吾國之文字學）古文書學，年代學，歷史地理學，譜系學，考古學等爲之補助，而又有政治學術之常識，卽足以勝任。推源主義，則於記述至爲所導藉，固須全具；又必有哲學社會等爲之基礎，於物心兩界及宇宙全體，透成徹悟。乃能成立而發展。吾國既無有系統之哲學，又無求實證之社會學，故推源主義不能發達，而記述主義，則累世擴張，頗有進步之可言。此章所述，僅屬記述一派，且僅以此以外形爲展開，至於記述推理兩派之方法，與其利病得失，則當別爲篇以論之矣。

吾國記述主義之史學。自春秋以迄今茲，自形式上言之，則當類別如左

一、以時區別者，謂之時代史，吾國前之編年史，分爲二類

甲、綜合的 如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

乙、單獨的 如春秋 左氏春秋傳 漢紀

二、以地區別者，謂之地方史，吾國前之國別史，分爲二類

甲、綜合的 如十六國春秋 三國志 九國志

乙、單獨的 如趙飛燕 華陽國志

三、以人區別者，晉兩朝之傳記，分爲二類，

甲、綜合的 如列女傳 高士傳

乙、單獨的 如東方朔列傳 諸葛武侯傳

四、以事區別者，大別之爲政治史與文化史，其類例甚多，分舉如下

政治史

甲、綜合的 如通典 五刑通考

乙、單獨的

法制、如唐六典 宋百官志（亡） 選舉志（亡）

經濟、如元和國計簿（亡） 大和國計（亡） 康濟錄

法律、如條制晉宋唐梁律（亡） 歷元條法事類

軍事、如歷代兵制 馬氏紀

中國史學之派別

社黨、如元清八人傳

北元末

東林列傳

外交、如三朝北盟集

門朝柔遠記

化文史

甲綜合的

如別錄

七略

七錄

子略

乙單獨的

學術、如宋元學案

漢學師承記

時人傳

宗教、如神仙傳

高僧傳

門元釋教錄

文學、如文士傳（亡）

詩評

樂府雜錄

錄鬼簿

藝術、如歷代名畫記

畫俗錄

印人傳

農業、如齊民要術

桂海虞衡志

閩中海錯疏

工業、如陶說

景德鎮陶錄

刀劍錄

視史

商業、如通商集（亡）

廣南市舶錄（亡）

風俗、如桂林風土記

番禺風土記

五、混合各體者，吾國謂之正史，如本紀年表之區別以時，世家之區別以地、列傳之區別以人，皆志彙傳之區別以事，亦分爲二類、

甲、綜合的（舊稱通史）

如史記 通志

乙、單獨的（舊稱斷代史）

如漢書 明史

六、以事之本末區別者，亦分爲二類：

甲、綜合的

如通鑑紀事本末

乙、單獨的

如三藩紀事本末

西夏紀事本末

上述六例之外，如起居注實錄等作，僅足以供史料；如通考會要等書，僅足以彙集案。皆不足與於史學之林，而此六類之史，皆由簡單而趨於複雜，又由混合而趨於分析，如先有春秋（以時代分）國語（以地方分）紀傳（如兩本紀伯夷叔齊傳，皆先史記。以人分）書，（如洪範呂刑亦開史記八書之體，以事分）而後有史記漢書，此由簡單而趨於複雜

者也。先有史記漢書之書志覺傳，而後有各種分析之政治史及文化史，此由混合而趨於分析者也。茲略述各種發展之次第，與夫史學之對象與目的，然局於時限，亦不能詳也。

一 編年史

西周之時，記載事實，時間之觀念未明，故無編年之史。自共和以後，始有春秋，然各國史記，皆藏周室，（見史記六國表）秦既得憲，燒之尤甚，蓋當時國典，自史氏外，齊民不得上觀此祕籍也，迨孔子修春秋，於是史記始布民間，編年貽於後世，不與周室俱亡，此則孔子之功，足以垂諸不朽者也。

今之言史學者，有區爲歷史文學歷史哲學歷史科學三階級者，孔子之春秋，無哲學科學之觀念。而文學則頗有可言，蓋孔子之春秋本由詩出也。孟子曰：「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主美刺，而實在言外；春秋主褒貶，若就一辭一句觀，而不比例以相致較，亦不能得其言外之意也，由此言之，春秋由詩出，彰彰明甚，謂爲歷史文學，難

曰不宜。

春秋既爲歷史文學。故祇推其言外之意，遂至人人異見，人人異辭。左氏之五十凡，公羊氏之三科九旨，各取顛倒，以說春秋，皆冒之故，待之成理。前賢謂「詩無達詁」，吾謂春秋亦然，蓋文學之性質本如是也。司馬遷謂，「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然其所指，皆在言外，亦仁者見仁知者見知而已，唐韓愈詩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終始」，尙能見其終始，雖三傳束閣，蔑棄師法，亦何嘗不可各尋其端緒，以自成一家之言？故歷史而以文學出之，令人迷亂，不知所謂，不可不謂爲幼稚之史學也。而猶曰「吾欲觀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見大史公自序引孔子語）吾未敢信也。

春秋之微言大義，雖如公羊所設之三世，由據亂而昇平，由昇平而大平，頗有合於進化之哲理，他若穀梁之所傳道，亦多有合乎哲理之言。然既非孔子所明言，則亦等於各人所創獲，惟方邱明恐人人各自以其意，以測孔子之言，異其端，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

傳。使人因實事而觀言，不因空言而求實，以與實事相背經。於是觀通之史學出，編年之文法定，所謂『較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惟左邱明始能實踐此言矣。

孔子之春秋、杜預所謂『言內則旨遠，辭約則義微』。非疏明其事之本末，不足以明其真相，俟其義旨。故左邱明之作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杜預說）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劉知幾說），既以五十凡釋經，又有齊不書先齊故書不言不防齊曰七類，以曲暢其義。使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歷而依之，使自約之，（杜預說）蓋傳之本字作專，爲六寸條，意在解經，能因經之言，而因著其事，使與亡之原委，經國之謀猷，風教之盛衰，政事之得失，彰往舉來，鉅細畢陳，此後世作史者所以奉爲模楷也。

史通二體篇論春秋之得失，以爲『繫日月而爲次，歲時以相綴，中國外夷，同共共世，草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顯盡一言，語非重出，此其所以爲長也。至於賢士貞女，高才傑德，事當銜要者，必肝銜而備賞，跡在沈寢者，不枉追而詳說，如梓縣之老，杞梁

之妻，或以爾晉卿而獲記，或以劉齊而見錄，其有宜如柳惠，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隨其粗也，則邱山是聚，此其所以爲短也」。案劉氏論春秋之短長，其言頗詳，蓋以年史之所長，即在明時間之觀念，敘事實之終始，使人尋其因果，以明事理。至其史學之對象，弊在局於政治，未視社會之全體，此史學初興之際，所不能免之弊也。

有孔子之春秋經，而後有左氏之春秋傳，傳以釋經，尙非純爲史體，至漢荀悅作漢紀，始有獨立之編年史，自是每代各有新作，起自後漢，迄於有明，或謂之春秋，（如孫愷魏氏春秋晉陽秋等）或謂之紀，（如袁宏後漢紀干寶晉紀等），或謂之略，（如裴子野宋略等），或謂之典，（如何之元梁典等），或謂之志，（如王劭齊等）名雖各異，皆依漢紀以爲準的。至宋司馬光撰資治通鑑，則爲編年之通史，以與漢紀等之斷代編年史相別。若純學孔子之經者，則惟偽託之王通元經，純學左氏之傳者，則惟偽託之薛收元經傳，兼學孔子之經與左氏之傳者，則有朱彥之通鑑綱目，其中有悅司馬光，尙有創作之

才，其他則陳陳相因，賸句成規，而不敢越，在史學上無進步之可言。至晉王通之擬經，以爲淫名僭制，罪甚揚雄，則擬者之習者，皆拘執不通者也。

一一 國別史

今世之言歷史學者，類以晉偏史爲歸。雖亦不廢國別史，以非有國別史，則晉偏史亦無所取材焉。吾罔嘗一統之世，帝王在上，雖諸國分封，各自爲政；然史體所尊，在一正朔。故孔子之時，惟有百國春秋，而孔子所修之春秋，必以周正爲歸也。左邱明旣爲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列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別爲春秋外傳國語，合爲二十一篇。（劉知幾說）。案此左邱明撰內語，設本史記漢書，蓋春秋以時間觀其通，國語以空間觀其別也。

上言春秋爲歷史文學，國語亦然。蓋春秋之時，已有百國春秋，然國自爲史，未明衆國別之史，而春秋爲一書也。時有十五國風，於是國語因之而出，余嘗爲中國古代文學

史論國語之源流，以爲「劉知幾作史通，體陳六家之史，明其優長，著其源流，則以左傳爲經年，祖國語爲國別之宗，分析史法，可謂精矣。若夫剖析而言，左傳多敘記之文，原始終終，鉅細畢見，至其記載言論，大抵輒綜典章，折衷尊祖，開以策命之文，多爲舉而發，故名益鉅製，十之三四而已。國語則多論議之文，其所記注事端，大都爲略而簡而不繁；其重任語，猶略語也，分國而載，故稱國語，其書上追國風，下開國策，欲觀全周列國之文章，比三書爲其淵藪矣」。觀此則國語爲歷史文學，殆非附會之言乎。

章學誠文史通義方志立三書義云：「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始可以通古人之遺旨，倣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倣律令典禮之體而作掌故，倣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徵，紀傳正史，春秋之流別也，律故典章，官禮之流別也，文徵諸選，風詩之流別也。馬史班書已來，已演春秋之緒矣；劉氏政典，杜氏通典，始爲官禮之緒焉；呂氏文鑑，蘇氏文類，始演風詩之緒焉。（又謂文鑑始有關於政治，文類乃有益於故事，與文選文苑實在文藻不徵事實者異）。章氏謂呂祖謙之宋文鑑，蘇大得之元文類，始演風詩之緒，余謂不

然。文經文類斷代爲之，實倣虞夏商周之書，爲尚書之支流，與孔衍之漢尚書魏尚書，王劭之隋書，同類并觀可矣。孔王之書，今雖不傳，史通謂「王劭隋書，雖祖祖之商周，憲章虞夏，觀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語，臨川世說」斯其徵也。若國經戰國策國別爲之，始可謂爲演以詩之緒矣。

因語而後，則有戰國策，其體例甚相似。孔衍之春秋後語，亦其流也。若司馬彪之九州春秋，州爲一篇，實爲後世地方統志之權輿，惟其書亡佚，十存一二，無由論議。後世史家，體例淆亂，名目糾紛，刻知幾史通云——「自魏都許洛，三方鼎峙，晉宅江淮，四海輻裂，其君雖號同王者，而地實諸侯，所在史官，記其國事，爲紀傳者，則規模班固，創編年者，則擬攝荀爽，於是史漢之體大行，而國語之風替矣」。觀夫陳壽三國志，路振九國志，名爲國別，實則紀傳；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崔鴻十六國春秋，其書亡佚，每由盜鈔，（遼氏春秋近有輯本，崔氏春秋，宋時已散佚，今所存者，有二本，皆爲後人輯錄綴作）。吳任臣十國春秋，實爲國別，能名則編年，故名春秋。觀其所載，則仍爲紀

傳，附以考表，且其中或爲本紀，或爲世家及傳，雖然有正統偏霸之別，紛亂糾紛，蓋莫甚於此者矣。

有史以來，曆今日之世界，足以當書偏史之目，其餘諸國之史，皆奉以觀，皆國別史也，若統一大地，則自古至今，實未有，正統偏霸之分，皆小智自私，坐井觀天之語耳，中國以赤縣神州之內，自視爲天下盡此，而又以國土爲帝王之私產，於是正統偏霸之說出焉，其實魏蜀吳三個相等耳，帝魏帝蜀奚爭焉；吳南唐前蜀後蜀南漢楚吳越閩荆南北漢十國與夫梁唐晉漢周五國相等耳，帝五代帝南唐奚爭焉，（五代史帝梁唐晉漢周顯唐資治通鑑），惟明夫國別之義，則此等自大之私見捐，而平等觀之公心出矣。

明夫國別之義，則晉與十六國皆國耳，作史者不必重晉而輕十六國，蓋之載記之列，而十六國之史亡，五代與十國皆國耳，不必重五代而輕十國，蓋之世家之列，而十國之史微，觀夫東晉宋齊梁陳與夫北魏北齊北周等史，並想齊稱，則其成效之彰明較著者也。

有國別史之實而無其名者，其惟明一統志乎，一統志之九州春秋以州爲綱，

一統志則彙集各省，舉而作，以省繁雜，故其舊皆同，所不同者，惟一統與割據耳，要其法則相類焉。

三 傳記

上言以人區別者，謂之傳記，蓋傳記初無區別，如陳留善藏傳，（魏森林撰），襄陽吾儔記（晉習鑿齒撰），列女傳，（漢劉向撰），女記，（晉杜預撰），裴氏家傳，（宋裴松之撰），虞氏家記，（虞掇撰），王君內傳，（華存撰），劉君內記，（王珍撰），東方朔傳，（母邱虛記），（以上諸書均見隋書藝文志），至於後世，始以錄人物者謂之傳，敘事蹟謂之記，分疆劃壠，似有不能相通者矣。

原大傳記之始，多由傳述師說，記載經義而起，如易詩春秋官制傳，禮樂皆有記，傳之本字爲專，爲六寸簿，古者書用簡冊，長二尺四寸者爲經，六寸之簿，便於札記，師弟之訓，口相授受，記之於簿，以備遺忘，故史謂之傳或謂之記，或兼稱傳記，易詩書春秋

國有傳，亦有記，如詩月齊志云，春秋有公羊氏之記，禮樂記有記，亦有傳，如禮官喪服傳周官傳是也，（上引各書，皆見漢書藝文志）又傳記者，門有劉向五行傳記許商五行傳記，（見漢書藝文志下），然則通會稽、賈傳記，（見隋經籍志）是也，若傳記之作，或記故訓，或記故事，如詩毛氏傳，則主記故訓，春秋左氏傳，則主記故事，韓詩內傳，則主記故訓，韓詩外傳則主記故事，然則傳記之範圍，本甚廣泛，不以人與事限也。

司馬遷作史記，（史記本名大史公，見漢書藝文志）雖六國年表及太史公自序已有史記之名矣，其後有東觀漢記，薛瑩之說記，記或作記，如宋史與魏志，紀又作志，（記志讀誌同誌）如陳壽三國志唐宗通鑑志，則記亦爲史之六名，而傳則專屬於人，而爲記之附庸，此爲傳記之一變。自王國作漢書，志記中，傳記人，實以後世記以記事傳以記人之端，然六代之時，則固未嘗分別也，如晉書之晉傳與晉記武昌先賢志（晉書附志）則傳記志又何異乎？自唐以後，始漸以傳專歸人，記專歸事，此又傳記之又一變矣，

傳之作，見於隋唐以前，不可不察，唐宋以來，爲古文，如韓愈歐陽修輩，均以爲人作碑傳，文必雅馴，必曰某公之作，何必以古人爲之，金帛之屬，名曰潤筆，公行賄賂，詐作一傳，以資炫耀，其弊也。故其傳雖行，而無信史。蓋後世修史，往往採錄乘以立傳也。黃宗羲作史案，隱括以三例，「一曰史取詳年月，野史取當是非，家史備官辭，系而已」。足以見家傳之價值，僅等於國史之起居注與實錄而已。蓋此等記載，例皆諱飾而不敢記實者也。

地方先賢耆舊傳，其亦出於小說。漢書藝文志小說家，有周紀周說之屬，其於諺訓之類，采於黃老之徒，方與郡野，即由此出。自漢趙岐撰三輔決錄，因得作陳留耆舊傳，魏晉以來，此風遂盛。魏百周廷政諸先賢傳，晉林瑛留廣耆舊傳，吳有顧凱吳先賢傳，晉有陳壽益部耆舊傳，范曄兖州先賢傳，其例不勝枚舉。今所存者，僅有晉書裴潛裴陽耆舊記。明陳大任百越先賢耆舊傳等數種而已。蓋自宋明以後，地方之志繁興，耆舊先賢傳記，皆孕包於志內，故其作遂衰。原其創作之起，不過追述英賢，爲地方之表率，作後學之楷模

而已。及其弊也，摺摺之習，僞飾之風，亦所不免，而地方之弊俗戾風，亦不敢有所紀載，以獲非於鄉里，蓋與家傳同其弊也。然後世徵考文獻，氣以觀其地方文野之度，社會得失之林，則亦足以見其一斑，與正史同其價值焉。

四 政治史與文化史

凡百學術，皆由混合而趨於分析，前既言之矣，政治史與文化史亦不外此例，自班固創十志，博稽歷代政典，嚮向作別經，劉勰累世學術；於是分門別類，各有專著，雖學術之畧仍未清，進化之軌跡不顯，僅虛談事實，詳為記載，然苟以科學之律，精為分析，著為部勒，則自可成為良史。然則其創始之功，儲材之始，亦不可沒也，比諸學類繁多，又亦冗繁，故分為甲乙二章

甲、政治史

自禹貢詳地方之制，陳賦稅之要，呂刑官刑法，周官詳職官，以已為政治史之樞輿，

然此諸作，皆爲一代之法規，未嘗詳溯淵源，實未足以資史也。司馬遷八書，已亡其三（禮樂律三書）其所存者，僅封禪書、胎前固草，餘皆不詳。惟班固十志，每書大政大法，必追述古始以迄於當時，於漢書歷周隋代，而十志則實爲政治之通史也。降及唐代，杜佑作通典，頗有條貫，觀其序云，「所爲通典，實采羣言，徵諸人事，將施有政。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

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設職官，然後興祀樂焉；教化暨，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貨爲之首，選舉次之，職官又次之，禮又次之，樂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邊防末之，或置之者皆知篇第之旨也。」此等網羅宏博，評議精簡，述其鋪陳政制，不能詳其創始之因，與其施行之果，未始有取貌追神之憾；然其整頓之妙，規畫之宏，亦有足多者。至於清代，悉采其遺規，有續通典、清通典之作，已不能及其簡要；若夫馬端臨之文獻通考，朱軾田之玉璽遺考，雖亦爲政治之通史，然或遺零繁，或支離得，其條貫不

及通典矣。法制之史，其完全者，百官春官選舉志一書散佚已久，不可得而論，惟唐六典一書，差足參攷。其書散仿周官而作，然用官僅取一時之制，唐六典則自唐虞而下，損益沿革咸具焉。（唐六典凡唐制則大書，歷代之損益沿革則細書於下）。其法又有二：一爲食典，如祠會典、尚書典等，其體亦仿唐六典，惟其損益沿革，僅詳本朝。一爲歷代職官表（清乾隆時永璽等奉敕撰）雖爲彙體，然每表之下，詳敘源流，亦上起古初，下訖於當時。他書蓋說之七國考，王應麟之漢制考，於七國兩漢之制度，摭拾殘剩，登爲章則，豈未足爲史，然亦爲考法制者所不廢也。

經濟之史，吾國更無有措旨者；唐宋以來，雖漸有留意及此者，如唐李吉甫元和國計略，宋韓絳治平會計錄，李常元祐會計錄，丁謂景德會計錄，田錫景德會計錄，及慶曆會計錄經費節要等書，（皆見宋史藝文志）皆爲經濟史之濫觴，其書雖皆偏於財政，未詳民間經濟狀況，然其書苟存，亦足與歷代正中之食貨志，同爲經濟史重要之材，惜乎其書皆不流傳也。自司馬遷撰貨殖列傳，農工商賈之事，皆詳記靡遺，民間經濟，亦瞭瞭矣。

而於國家財政，又別撰平準志，故經濟之史，唯遲始能注意及之，然此入於正史範圍，故於此不能引例。而經又有素王妙論一書，亦頗言貨殖之事（史記正義引七略云，司馬遷復素王妙論二卷，史記正義集解御覽四百四，四百七十二，皆引素王妙論，言管仲子貢計然范蠡呂不韋等理財殖貨事。）自是厥後，言民生資竟無終其之史，惟於河防水利荒政等事，略有言其源流，誌其大概而已。言國計者，自唐宋而始。顧綜大要者，尙有其人，（明汪鯨有大明會計類要十二卷，張學顏萬歷會計錄四十三卷，皆見明史藝文志）而分記之作亦多，如田賦漕政和運使弊蠹法倉庫積政蠹治茶馬屯田諸事，或爲之記，或爲之志。甚至明而大盛矣。

法律之史，更不待觀。呂刑一篇，已略言法律沿革，自是厥後，惟各史刑法志，言之頗詳。單行之史，實未之見：惟隋志有隋宋齊梁律二十卷，聚四朝之律於一書，實可見其損益沿革，然書已亡佚，實無由證其新。至明有臨廷官刑部志，龐嵩刑誓志，陳公相刑部文獻考，來新行刑部獄志，江山縣南京刑部志，（均見明史藝文志）今亦未見流傳；清

沈家本《歷代刑官考》一書，亦其流也。家本又有《刑律註明書》，每條律文，皆舉歷代沿革，詳其源流，賞其取舍，與唐律疏義釋文有別異，與刑罰官諸考志僅言故事者亦異。此雖不名為史，實法律史之先河矣。

軍政之史，作者頗多。宋有曾文子《補遺兵志》陳傅良《代兵制》明有李材《兵政紀略》，楊時喬《馬政紀》，清有八旗通志》，（此皆以兵制為主，兼典章人物等），皆於正史兵志之外，獨具存著，言其制度沿革。而曹聚《法戰論》戰守之史，如明吳從周之《兵法紀略》，鄭璧之《古今兵鑑》，顧亭之之《明武功紀勝通考》等，皆不在此例。

社黨之史，作者亦多。自范曄《後漢書作黨傳》已開此例，然在正史，不能援為例證，宋有慶元黨禁一卷（不著撰人名氏，刊於知不足齋叢書）清陸心源有元祐黨人傳十卷。戴元結《碑凡》三百有九人，宋史有傳者，及百人，或附見而不盡詳，且有舛誤。故時偏授筆緒，備為一傳，末附黨禁始末。考元祐黨禁者，此書其詳矣。明代社黨，記者獨多。邱繼有《東林傳》二十回卷，陸世儀《復社紀略》四卷，吳啟業《有學社紀事》一卷，杜濬有社

事始末一卷，又有東林本末六卷，惜其不傳，今僅有東林事略三卷，列於荆院逸史。（東林本末不知撰人姓名，東林事略未有東林本末序注云，「計其六卷，在陳其年維嵒家」。事略殆其節本）考明之社黨，尚有鄉社邑社兩社北社知社匡社隸社等，無有專書記載，故亦題爲前人所知。吾國社黨，非若歐美諸國之有黨綱政見，足以標示於國人，其初不過宦官當路，權奸竊柄，目其反對者爲黨人，爲一初打盡之計耳。至若明代諸社，亦不過標榜文章聲氣，實爲文社，而非政社。其後稍有得志者，於是結爲黨援，干預政治。然則吾國社黨實爲幼稚，亦不失爲政爭之具，足以爲政黨之先導，故其絕妙不可忽視云。

外交之史，自唐而後，作者亦多。如唐有李德裕西蕃會盟記三卷。（見唐書藝文志）宋則有皇華錄一卷，南北聯盟錄一卷，藩盟記一卷，皆不知作者。張栻有金甌譜和事跡一卷，寇殲有率使錄一卷，王昭戴斗有率使錄一卷，范綱仁有使高麗事錄二卷。（均見宋史藝文志）元則有劉郁西使記，元貞使交錄（均見元史藝文志）明則有張寧率使錄二卷，費瑄使朝鮮錄三卷，謝杰使琉球錄，倪謙使交錄。（均見明史藝文志）孫其書大半散佚，

然自唐以來，注意新事，亦可概見，今所存者，惟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其書爲紀事本末體，記載宋金和戰之始末，分上中下三帙：上帙御政和宣和之事；（二十五卷）中帙紀靖康之事；（七十五卷）下帙紀建炎紹興之事。（一百五十卷），皆採集諸書，編年作繫，雖失之太繁，然記兩朝交涉之事，未有詳於此者。清光緒中，王之春有同朝柔遠記十八卷，自順治以迄同治，於中外交涉綱目，以凡通商始末，皆編年記之。雖不無自大之見，然指陳交涉得失，亦頗分明，抑亦外交史之流亞也。

乙、文化史

莊子天下篇竊綜學術源流，已爲文化史之先導。司馬遷繼之，其於史記列傳半爲學者之傳記。自管宴老莊孟荀申韓孫吳蘇張計范諸子，以及仲尼弟子，漢代儒林，風賢鄉校司馬淮南之文學，屈鵠公公之方藝，所謂諸子百家。莫不詳爲列傳。或連類附見。是則司馬之史，其注重文化，可謂不遺餘力，然此屬正史，不特引爲例證。惟劉向校書，著爲別錄（隋書經籍志七略別錄二十卷，劉向撰）漢書藝文志所謂「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

其指意，錄而奏之」。即傳此也。今其書雖散佚，其存者猶有管子書錄、晏子錄、孫卿書錄（轉非子書錄不著名，縱可均疑是類同作，他者列子書、關尹子書錄，亦著同名，疑皆後人依託。又有鄧析書錄，亦不著同名，而冠林及荀子、楊倞、江高似孫子略，皆云同作，然此亦出於後人依託也）。於此益目指意，固已不甚確錄；而其附錄行事，尤詳為敘述。觀各書所載別錄逸文，如王忠氏（漢書藝文志注引別錄云：「六國時人也。」）徐子（史記魏世家集解引別錄云：「外黃人也。」）關子（史記周本紀集解引別錄云：「名能對於楚。」）杜文公（漢書藝文志注引別錄云：「韓人也。」）則其時代，著其國籍。我子（漢書藝文志注引別錄云：「爲墨子之學。」）文子（史記荀卿列傳索隱引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以於墨子。」）尉繚（漢書藝文志注引別錄云：「按爲顏君學。」）則著其師承。申子（史記申韓列傳索隱引別錄云：「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備過太史公所記也。」）則審其篇目。騶衍（史記荀卿列傳集解引別錄云：「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其世天事，故曰談天。」）則明其指意。是其甄綜學術，分

部別居，條析源流，固已極文化史之能事矣。而世間上言條別之學區之，固漢之乎漢，隋者也。世後對徵七略，班固因之而爲七略，文已亡矣，法已廢，幾乎廢爲目錄之事矣。其後齊王儉有七志，梁阮孝緒有七錄。七志已亡，七錄原有十二卷，今僅存序與目而已，故其內容若何，亦不敢臆言。論曰：七略中有一篇，非僅古今書籍存亡之大概，此亦足以爲文化史之寶，而阮、梁二書，亦不若七略之文之該也，蓋其皆既缺，自不能以此相資也。宋有王堯臣撰文獻目，晁公武撰郡齋讀書志，其後有直隸州志館編，清有四庫全書總目，雖各有品藻，然條別之源已不司，部居之分別亦非，故舊世有校讎學，章學誠有校讎通議，皆思復向徵之舊志，以理證之，其理固大，彼二人者，亦未足以語此也。其後言目錄之學者，僅能考版本之源流，言校讎之學，僅能辨字句之異同，斯則其細已甚，更不足以窺見向徵之巨矣。惟宋高似孫子，其說曰：子，包存其目，其下四卷，則全爲論斷，頗似馬敘自叙，其說固非，然亦疏矣。（云云）文化史，此節之言實屬點石成金之史，其所以爲文化史，其所以爲目錄，其所以爲校讎，其所以爲一門者，皆在此也。

學術之史，自明黃宗羲與家山，規模始宏大。先是，周海門有理學宗傳，孫鍾元有理學宗傳，皆言理學之源流，然以以理學亂其流，或雖救而不原其，頗覺疏略。於是黃氏爲明儒學案六十二卷以正之。既成此書，又校閱宋元諸儒而爲之述其學派，成宋元學案，然其原稿不肯卷致，全賴黎修定序錄，列爲百卷，其書述各儒傳授源流，詳爲表列，頗覺清晰。每一學派，首述其行事而爲之傳，次摭其言論以表其學，終復加案語以評其得失，或附錄逸事及他人之評論。其爲傳也，補正史之傳錄較簡要，然於其學術之大凡，及其生平著書交游著作，亦不加詳述，實與史傳亦無異也。（馮氏校刊宋元學案條例云，「是書皆補，謝山兼爲修宋史而作，故有宋史所略，而書刻傳特加補苴，惜多本之永樂大典，其中經濟著述，固未采入」。可見此傳不特爲學案作也。）所摭言論，有時亦不能代表其學術，於其學術之本末得失，實不能如諸學。而其評論，徒肆口辨，間有不衷於理者，又復入主出奴，陸王釋朱，便勢如水火。故不爲客觀之敘，其與杜，而約爲主觀之肆其交攻。黃宗、陸王，全公釋朱，已不免有此弊。但書原意之明，通辨——攻陸王，與鼎之章，其學

案申鑒王唐鑑之學案小體，又申薛本，其經旨亦案，皆於戴震諸人，又斷漢宋交攻之弊，學術之異相，往往爲其好惡所左右，蓋鍾科以嚴治之律令，又無學史客觀之精神，故其成就止於如此。然其爲吾國學術史之先導，其功不可沒也。其後江藩乃漢學師承記八卷，經師經義一卷，又爲宋學淵源記二卷，附記一卷。其爲師承記則云，「經術一壞於東西晉，一壞於南北朝，一壞於南宋之道學，元明以來，此道益晦，至本朝，三聖之學，盛於吳中，江永戴震兩君繼起於衆，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沈埋，一朝復旦。」其爲淵源記則云「近今漢學昌明，徧於寰宇，有一知半解者，無不稱漢宋學。然本朝爲漢學者，始於元和惠氏紅豆山房半農人手書程帖云，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不以爲非，且以爲法。爲漢學者皆其師承何哉」江氏之書。其敘諸家學說，頗得要領，然其互訛之陋習，至顯而易見，亦所不免。同時阮元撰時傳四十六卷。自上古以迄嘉慶初年，凡中外言經法義之學者，皆就其行事，述其學說，復綴以論，以明其流變。（自卷一至二十述中土，未四卷述西洋，頗無門戶之見。）蓋所纂之學，頗覺其虛，且以後起者爲勝。西學之入吾國，以此爲始，良由理無二

致。故首必驗人焉。學僧之出世。此皆在仙山也。後士人續補之。合刊行世，零賸人二字，蓋隨廣泛，不信其虛實之人，遂據之，如付託云。「察梁世祖傳爲時。」考王梁七傳市哲相亡時以世祖爲者亦爲時人，則阮經二氏之小究也，其實專家之學，皆可仿照，史，僅條例略增改正。一幹梁枝，明其源流，俟其異同，不可如學案等之漫無比較衡實也。

宗教之史，蓋有由來。自齊王僧虔七志，佛經道經，各爲一錄，梁阮孝緒撰七錄亦特列佛法爲仙道錄，北齊魏收撰魏書志有釋老志，此相對宗教而有系統之記載者也。後七志七錄，實已告佚，尋老志又入於正史，皆爲舊例。佛志以爲劉向，已有列仙傳之作，（見隋書經籍志）有補遺之，乃有仙傳十卷。仙傳集門，仙傳傳。作者紛紛，繁縷有徒，而佛法則與有。實以二名僧傳三十卷，（見隋書經籍志）得僧知編之，亦有高僧傳十四卷（今存）其後名。以師承僧比邱尼。仙傳皆以人爲限，未據厥字。隋唐以來。佛法之史，以多名著，如隋僧祐居士撰法苑珠林代三寶記十五卷，

文選之史，詩序爲之極興。蓋詩三百篇，大抵皆不知作者，作序者爲之稽考史乘，以詳作詩之原由，或述作者之姓氏，使學者論世讀詩，知其源流正變，亦後世史文學史之始也。惟作序者不知爲何人，其論紛紜，此不必辯。司馬遷作史記，原原賈誼枚乘司馬相如等文人，特立列傳，范曄後漢書，遂特立文苑傳，然此屬正史，無勞舉例，自晉張隱撰又士傳五十卷，魏虞興爲文志四卷，文章流別志二卷（隋志又羣流別集四十一卷，梁六十卷，志二卷，論二卷，又有文章流別志四二卷。）單行之史，乃漸興盛。其後傅元續文章志，宋明帝有晉江左文章志，沈約有宋世文章志，皆其流也。惜其書皆已散佚，存者亦僅百之一二耳。惟梁劉勰文心雕龍，敘文章之源流，鍾嶸詩品（隋志作詩評。）述詩人之流別，言文學者，皆舉之以爲鑑，故其書賴以不亡。唐裴鉞有續文士傳十卷，許敬宗有文館詞林文人傳一百卷，亦已散佚。降至後世，選總集者大抵皆爲文人立一傳，（如胡震亨唐音統籤，錢謙益列詩朝集，其後至唐詩全五代詩全金詩五朝詩別裁等皆有小傳）又爲紀事徵略之作。（如唐詩紀事宋詩紀事明詩紀事及詩人徵略諸書皆述詩人事跡爲多。）其他

言詞者，有歷代詞人姓氏錄，言曲者有錄鬼簿等書。然作者雖多，皆散無友紀，不爲源流派別之言，以視文心雕龍詩品且不逮，寧足以言有系統之史哉！

藝術之史，以繪畫爲最詳備。自齊謝赫撰古畫品錄，陳姚最撰續畫品，已發其端。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十卷，自上古至唐會昌，所有畫家，皆爲小傳，間述其派別源流。宋郭若虛又作圖畫見聞志六卷以繼之，所述自唐會昌至宋熙寧。宋郭梅又作畫繼以繼之，所述自宋熙寧至乾道。元夏文彥別作圖繪寶鑑五卷，所述又自上古至於元。明韓昂又爲續編一卷，所述自明至嘉靖。清徐沁別作明畫錄十五卷，所述有明一代。而述明末清初者，則有周亮工之讀畫錄。（四卷）述清初以至乾隆初年，則有張庚之畫徵錄（三卷。續二卷。）其後馮金伯有國朝畫識（十二卷。）吳省屏畫識（十卷）蔣寶麟有墨林今語，（十八卷。續一卷。）此皆累世繼述，昭示來茲，而圖畫之史賴以不墜者也。其次則法書：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十卷，起於東漢，迄於元和，與歷代名畫記並行；特敘述無人，故不若繪畫之詳備。惟宋意更書錄三卷，清馮武書法正傳十卷，差堪繼武。他若宋宣和之書畫譜（各二十

卷。○清康熙之偶史書畫譜（一百卷）。明閣、儀之書史會要（九卷，補遺一卷。明朱厚學校註一卷。朱厚學之書史會要（五卷）則又分舉各代，以分門。頗足以爲其羽翼。蓋法書爲畫，著述，多，或言其品，或言其法，或著收錄之目，或言鑒別之例。以歸繁多，不可殫述，惟言其別源流，足以彰其源流，視其流化者，以上所舉傳記，非未盡爲合作，亦足以供藝史之選材已，若夫私印之術，元代以來，亦有爲之作傳記者，如周亮工之印人傳三卷，汪啓淑之續印人傳八卷，葉銘、廣印，傳十六卷，亦足以見其一斑。他若金石雕刻文房古玩之屬，門類志錄諸作，皆藝史有從，而若元臣友，墨史，（一卷，集古墨譜製墨者凡一百五十餘人旁友高麗吳丹西城之墨亦錄，搜其）書畫印人附傳記足以並觀齊取者亦夥矣。

農桑之史，作者甚夥。自夏小正詳言農之節候，於月曆有七月之節，秦有月令之篇，漢亦有四民月令，後世且有七十二候之說，元魯明海農桑衣食撮要即以農風諸事，分繫於十二月令。此農桑中及時經驗之長史也，管子地員篇言九州之士有常，而物有次。凡土土

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三十物、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此農業中土宜經驗之法史也。（地は實計辨土宜種類之學，必由累世經驗而來，必非管子所創。世後世不得。）後魏劉勰著齊民要術十卷，詳言農事，中有引記勝之述伊尹區田之法，自伊尹以之，又有漢田代田之說，并田區田之制，但若魯論有記（見老工記）末報有姓（唐陸龜若一卷之七）田區田之史之散見於各書者也。元有農書（二十二卷，王桢撰，凡農桑通說六卷，農器四卷，農家十二卷。明有農政全書六十卷，徐光啓撰。日本田代良永利撰。農桑輯要輯收之，說荒政十一類，頗稱該備。）清有授時（一十八卷，乾隆撰。分天時土宜農功。勸課農桑八門）此三書者，雖非農史，而取有所得，誠足觀焉。他若酒經、茶經、羣芳譜、奇器圖、杜海虞之志、閩、浙、江、蘇、諸如此作，不可殫述，由此言之，吾國確有農業之史，而史尚未有不豐於也。

工業之史，發達最古，自魯本作器，詳記車服器具等製作之原，估其時已亡佚。然

徵見於各書，略可見焉（證記明堂位正義曰，世本書名，有作信。其篇名亦作畢。）如吳仲作畢，（御覽七百七十三引世本下引做此。）胡曹作冤（注云，胡曹黃帝臣。左昭二十四年傳正改引。）作衣，（詩史國名紀六引。）垂作飲（御覽八百二十四引。）作髮，（六傳三十三年傳正改引。）密裁作瑟，疎農作舉，（風俗通引）杼作甲，（初學記二十一引。）杼作引，夷牟作矢，（注云，揮夷牟黃帝臣。禮記射義疏引。）少康作箕帝（御覽七百六十五引。）公輸作石禮，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楠父作春，（御覽七百六十五引。伯夷作升，（御覽一百八十九引。）其鼓貨狄作舟。（藝文類聚七十一引。）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其後作史者，恆與假之制，略有隱戒，其器用工作，頗以形下賤視，恆有持續記越者，遂致日用之物，如牀、椅、桌、椅、簾、物，且無可知其始於何時，作於何人者，其器具之微，改良之時，並無論也。晉以工業之盛守古制，不能發展，大半由此。其後惟宋沈括夢溪筆談，稍記工藝，且兼言算數物理。如言磨礱器物皆制，透光鏡承日光而銘文遂壁上，窪鑿印人面大，凸鑿印人面小，唐高宗之王輪，吳越王之木塔，喻船營舍之法，昇昇活版

之術，皆何言其理法，總於樂律推算，尤爲其事門過半，言之更詳。他若附弘景之古今月劍錄，王象之瑤室集古錄，王勰一宜和博古圖，呂巽之宣德鼎賦譜，亦可以考見製作之源流，然此諸書，皆未成史體，惟晉放祖珣所著兩說六卷，言陶工原史，最爲詳備。（第一卷說今，言饒州今窯。第二卷說古言古窯鋪三卷說明，言明窯及造法。第四卷說器上，唐虞舜周器造器觀晉南北朝器。第五卷說器中，唐宋器元器。第六卷說器下，明器。）此則可爲工業史之梗概矣。

商業之史，以吾國重農賤商，故歷有爲之編載者，惟司馬遷貨殖傳中載都會之發達，及商人傳記，爲商業史之梗概。然此屬正史，終分舉例。其叙惟宋嚴粲明有通商集三卷，題曰廣市訓，三卷，（見宋史藝文志）專言商事，惜其言已佚，無可考証。至明有只言市志四卷，傳淡齋治志二卷，王宗聖惟政紀十卷，頗亦間及商務，然至清今，亦有市面書。清自中葉後，市面大開，與外人通商，宜有專爲之史者。光緒中，坊間流傳有王之澤市面始末記二十卷，然其言，實卽王之市之國初案，記也（見外文史條）書估其

名以求利耳，是後兩代通商之舉，亦時有可為之記載者，誠微事也。惟同治時夏楚，撰中西國事二十四卷，中有互市條，清尼卒末，五口辟通，詳列土稅諸語，頗言通商之事。其他散見各諸家之書，及海國之條，實以洋史家乘之記，實錄有徒，惜乎無八島之條，而為實史也。

口俗之史，非言亦古，自漢宋續修風俗，班固輯之，以附於漢書地理志之末，言風俗者，其仁何五什詩，以十國以二雅三頌之不同，亦頗探原於風化。學者欲觀吾國古代之風俗，則以二雅三頌為簡賅之史。（唐作五代史志，而其地理志則依古九州區畫，惟其口俗所得矣，然其口俗以外，則罕以暇，條列全局者，實罕其親。惟漫讀陳留郡仁何（隋志、晉周處有陽羨士風，見唐志及史通補注條）宋孝王有開京風俗傳（見史通補注條）唐張周封有華陽風俗（見唐志）他若北荒風俗記，諸春一俗記，突厥風俗，風俗小宜（以上皆見隋志）高麗風俗（見唐志）諸書，亦實錄有徒。然咸取於一地，或勝一鄉一方，或僅錄外國，固與與朱鄧等並錄各郡者也。惟顧炎武作日知錄，中有世風一卷，

詳言歷代風俗，如周秦風俗，秦紀會稽山剡石，兩漢風俗，正始，宋世風俗，等條，頗能言其盛衰大者，惜其偏言士風，未能條舉實俗，亦因偏而不全。今日而欲爲風俗史，則必採取社會學之精意，應用人類之條理，庶乎其可以超出於古人之上矣。

五 正史

前言混合各體者，吾國謂之正史，如本紀年表之區別以時，世家之區別以地，列傳以人，書志記傳之區別以事，而此混合各體之史，皆創於司馬遷，以司馬史記有本紀表世家列傳也。

秦嘉謨世本輯補，謂史記之本紀世家列傳，皆本於世本。『左傳襄二十一年正義引記文曰「太甲湯桀」』史記索隱及路史注亦引世本紀文，記記皆同，此即史記本紀之所本。左傳桓三年正義引世本曰「武公，莊伯子。韓宣其伯弟」世本世家文』，又襄十一年二十一年正義正義引世本文，此即史記世家之所本。史記魏世家索隱引世本曰「桓子生文

辰斯其傳云：「子撰，是魏時之子」。則世本世家外，復有傳，太史公作七十列傳，其名亦本於世本也」。案秦氏推本本紀世家列傳於世本，其言甚辯，若依其例則表與書亦可謂本於世本。表爲公孫字世表之表，乃譜之假借字，世本有帝繫及王侯大夫譜，卽史記表之所本。世本有作爲記占驗飲食禮樂兵農車服圖書器用藝術之原，史記八書，卽本於此。雖然，世本一書，劉向以前，未嘗稱引，（史記集解序索隱引向曰「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之所記，凡十五篇，漢書梅福傳後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跡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而書經稽古世本二卷，劉向撰。希羅以爲世本禮記策皆劉向撰，而班彪謂司馬遷采左氏國語創世本職田策。竊謂世本職田策，恐司馬遷皆見不及，故春秋正義云，今之世本與司馬遷不同也。余別有世本考）其書有燕王喜漢高祖（見顏氏訓證證篇）亦未必爲古史官所記，司馬遷得見與否，實亦未可定也。

司馬遷所撰本紀及世家別傳其體非其所創，固可斷言，本紀爲編年體，本於春秋，而其名則本於禹本紀。（史記大宛列傳云：「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又云：「禹本紀山海

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表之本字爲譜，桓譚新論及劉向書云，「太史公世世，旁行斜上，並效周譜」則表本於周譜也。）（史記三代世家云，「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十 諸侯年表云，「太史公讀春秋經傳」是亦可爲一證）。尙書之西貢洪範呂刑等篇，即開後世書志之體，則書本於何書也，史記循世家，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是史記以前已有世家也。史記伯夷列傳，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云云。則史記以前已有傳也。春秋左氏傳故事，亦爲傳之發端，惟一以時爲綱，一以人爲綱耳。由此言之，史記以前，史之各體，固已有之。司馬遷特混合各體以爲一書耳。此史學進步之徵也。

歷年之史，往往屬於政治，未視社會之全體，正史則差能免此弊。世言二十四史爲帝王之家譜，不載民事，亦未免過爲苛論，且未嘗測其寄。且如司馬遷史記，本紀書表世家，固不免於政治，計於貴族。然其篇數，僅占六十，而列傳七十篇，大都詳載文化，自漢迄魏晉，史記之吳越越計范諸子，以及仲尼弟子，漢代儒林，屈賈鄒枚司馬淮南之文

學，扁鵲有公之方技，以及諸子百本，莫不許爲列傳，是逆屬附見，前既言之矣。他若諸叢書中如補史記、史劄記、日知錄、音義、傳，大抵詳察社會，精言民事，而文臣武將，則僅舉其大者。其班固、書又加地理藝文二志，條舉風俗，詳言文化。司馬彪續漢書則有輿服志，魏收魏書則有職官氏二志。而蓋傳之中，如范曄後漢書之文苑獨行（後世卓行一行經傳本此）。逸民（後世隱逸）逸士（逸士傳本此）。蘇頌方術（後世方伎藝術等傳本此）。列女宦者等傳，姚思廉梁書之止足傳，歐陽修五代史記之伶官傳，以及宋史之道學傳，新唐書之藩鎮傳，明史之士司傳，皆隨世所重，尊爲記載，則社會變遷，亦未嘗捐棄弗遺也。

劉子玄曰正史之得失，其言甚辨。以爲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涉論，逮於天文地理，圖表朝章，隱顯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爲長也。若乃同爲一事，分在設篇，斷續相離，前後廢出，於高紀，則云晉莊項傳，於項傳則云事具高紀。又趙主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候，先輩而抑隨末章，致使漢之賈逵，將楚屈

原同列，魯之皆疎，與莊桓何涉，比其所以爲短也。（見史記二禮篇）華正史之體，修史材則何稱謫，言史理則皆變元符，二見其最缺之點，在明因革之關係，探源官之真相，若同爲一印分存數府，斷絕相聯，其法周固，則結末難尋，因果斯昧，子玄之論，可謂切中其弊矣。

劉子玄史通特著本紀世家列傳表，皆忘五禮，以證其行失，竊謂史書有是有非，不可不辨也。本紀篇云，「天子爲本紀，諸侯爲世家。姬自后稷立於西伯，自伯翳至於莊襄，皆乃諸侯，而名稱本紀，項羽僭盜而死，未與成君，春秋與楚僭據，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篡盜，况其名曰西楚，雖止霸王者乎？竊王者卽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謬」。案本紀者，述其宗祖曰本，奉其正朔曰紀。周自后稷至於西伯，奉自伯翳至於莊襄，僭止諸侯，而實爲天子之宗祖，必欲證之世家，是欲臣其宗祖昧其本源也。自周赧王亡至秦昭襄帝，中間統者三十四年，山陰周秦，故列秦之本紀。自秦子嬰亡至漢昭帝，中間統者四十年，而漢之興封諸王皆項羽。故列項羽爲

本紀。必欲稱項羽爲僭盜，則劉邦何嘗非僭盜乎？必欲以稱王爲非天子，則夏商周何嘗稱帝乎？子虛成敗論人，實非公論。且史記尙有呂后本紀，以少帝非惠帝子，而政歸呂后，故列呂后爲本紀，而子玄不敢論列，似避武后之嫌，惟於范曄皇后紀特致彈論，（見列傳篇）由此言之，子玄於本紀二字之義，尙未必然也，世家篇云，「陳勝起自卒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爲稱，豈當然乎？」案諸侯爲世家，劉據稱王未成一統，故亦列之世家；况漢秦之祀，涉實發難，若存班固，必列涉於載記，似覺更當。子事必欲以盜稱涉，毋亦成敗論人，又云「諸侯大夫家國本別，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爲君而前，齒列陪臣，周身藩后，而前後一統，俱歸世家，使君臣相雜，升降失序」。案帝王追其本，諸侯詳其世，本末既明，因果斯列。且子孫爲諸侯，使其先世祖宗爲臣，其齒與齒本紀同矣。編次篇云，「尋子長之列傳也，其所編者，唯人而已矣；至於龜策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諸首同科，俱附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策所記，全爲志體，何者與八書齊列，而定以世名，庶異物得其明，則聲相應者矣」。敘事

傳云「日者倉公龜策傳函所取焉」。子玄以爲傳以記人，志以記事，自是唐代俗見，昧於傳記之原。不悟子長列傳，原有以人爲綱以事爲統兩類，以事爲統，後世謂之系傳，又稱彙傳；蓋書志之記事，重在政治，彙傳之記事，重在社會，例如平卒書與貨殖傳，皆記財貨之事，而其言實有不同者也。表附憲云，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傳，至於祖宗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互相攸證，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鑿乎？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其間，絨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案史之有表，所以通紀傳之窮，有其人已入傳而表之者，有未入傳而遽類以表之者，表立而紀傳之文可省，此萬斯同所以補歷代史表也。觀夫宋史表少而紀傳繁，遼史表多而紀傳省，此其明效也。（史通雜錄篇云觀太史公之創表也，列行彙行以相周，編字撮義以相排，雖彙越萬里，而於徑寸之內，大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尺中，雁行有敘，使讀者閱文便視，羣目可詳，則子玄於表，後亦知其有用矣。）子玄書志一篇，論排文辭，以爲刑法證類

風土山川，求證文籍出於三禮。而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蔡邕曰章，韋昭曰典，張衡曰錄，何法盛曰說，名目雖異，體統一歸，其推源可流，特務明允。苟於漢書天文藝文五行三志，以爲可以刪削，毋乃妄哉。宋史志行略志雜考之類，老志亦以爲不啻之類。而可以爲志者有三，曰郡邑，曰氏姓，曰方物，夫五行符瑞，輿論社會心理有關，實不可以去，天文則代有發明，藝文則世有增損，一志可以觀教化，降及後世，景回諸教，雖然并作，尤不可以無志，惟其皆不可以用老眼耳。夫藝文釋老均爲一代文化所關，何可不詳聚史料，以爲後世之參考？而子玄所載元祐文，以爲『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爲日相繼，類煩互出，何如以水清冰泐能飲之？』夫文籍代增，誠不勝收，然防刪損益，非無其從。一則當代所撰，務宜全列，子玄亦既言之，一則前世舊書，亦既有目，史既斷代，則當時亡佚之書，史宜備載，如漢代之書，發於元帝，宋鳳之籍，淪於金源，此宜詳記者一也。亦有前世亡佚，而忽爾復見，如晉之孔壁，晉之汲冢，荷之敦煌石室，永樂重獲金元之書，日本尋歸唐唐諸經，此宜詳記者又一也。當唐之世，七略七錄猶存，故魏徵隋書文經籍，類

而無當。若使子玄生於今世，必以爲吾國文化所存，全恃二志，得觀其條，又何難其妄改換！

史學要義，以最近者宜詳，良以當代各事，皆由最近歷中遞嬗而來，其關係尤爲密切，吾國史家，頗明斯義。司馬遷史記百三十篇，自上古至秦楚之際，年代綿遠，僅占其半；記載漢事，亦占其半。（史記一書，本紀十二篇，漢占其五，表十篇，漢占其六，書八篇，漢占其四，世家三十篇，漢占其十二，列傳七十篇，漢占其三十八。故自黃帝至秦楚之際，約六十五篇，漢亦有六十五篇。）而漢五世，（高祖文景武）武帝時事，載之尤詳。約占五分之一，（漢六十五篇，而武帝時事，約二十六篇。）可謂最近而最詳者矣。班固既載漢事，共爲百篇，自是厥後，每易一代卽新編一史，以應於清，追蹤前式，亦成明史，蓋亦以最近之史，於當代尤爲切要也。不特此也，班固既成漢書又作世祖本紀，並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此亦記載當代之史尤詳於近世史之明證也。自是之後，私家記述當世之史，代不乏人。自魏收魏書有職史之目，至隋開皇乃發令禁絕人間撰集國史，廢否人物，於是設官修史之局闕，私家著述之風微。然國史雖

爲官修，而野史之業，仍未絕也，南宋兩朝，其尤甚，尊王攘夷之微議，爲外來君主所最忌，至潛順而應之，乃大興史獄，莊起而滅名世以此祿免，乾隆時又銷毀明季史書，不遺餘力，自是私家記述當代史事之風絕矣。故今日而欲言史，當屏除官史而覓諸私史，又當整泐古史而尤宜注重當代之史。（此理古史，以通史爲歸，注重當代之史，則自清中葉迄以民國今日，百年之間，尤爲重要。吾國舊時，以史記通志南北史五代史皆目爲通史，其實史記通志略具通史之質，南史五代史則章學誠所謂斷代史而已，不可混也。

六 紀事本末

以一事爲綱，而記述其始末，始於尚書之金縢顧命。至宋袁樞，乃有紀事本末一體，此亦史學進步之徵也。蓋相傳之辭，一事複見數篇，主賓莫辨；編年之辭，一事隔數卷，首尾難稽。世於事之因果，皆難綜核，而欲發明大律，以揮人事，固其難也。自紀事

本末出，遂使紀傳題年，實而爲一，以事爲經，以時爲緯，遠因近果，於一微備。蓋史學發達之次後，其始離記事端，年月莫備，其次詳編年月，始末間隔，再進則事時兼顧，始末萃列，擇因尋果，方臻精密，蓋斯紐發生，固非一朝一夕所能成也。

自宋袁樞撰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或作二百三十九卷以一篇爲一卷耳）楊萬里爲之序，以爲「予每讀通鑑之書，見事之肇於斯，則借其事之不竟於斯，蓋事以年隔，年以事折，遺其初莫緣其終，攢其終莫忘其初。自袁許出，大抵率事之成，以後於其萌，提事之微，以先於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約，讀其書，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宋淳熙本通鑑紀事本末序）而趙與峯亦云「通鑑以編年爲宗，本末以比事爲體。編年則一事而歲月淹隔，比事則雖累敘而脈絡貫連，故前通鑑名如登高山，泛巨海，未易遠觀其津涯，得本末，而讀之，則根幹枝葉通編相生，不待反覆它卷，而瞭然在目矣。」（宋寶祐大字本通鑑紀事本末序）是紀事本末者，實所以改編年之弊者也。其後明陳邦瞻作宋史紀事本末二十六卷。（或作一百九卷亦以一篇爲一卷）元史紀事本末四卷，四（或作二十七

卷）雖以宋史元史爲名，似爲紀傳體而作，其體仍以編年爲前驅也。蓋其時薛應旂有宋元資治通鑑一百五十七卷，王宗沐有宋元資治通鑑六十四卷，故倣此事次年，有條不紊也。

清登瀛谷應泰撰明史紀事本末八十卷，此書先明史明紀而成，既無紀傳之史爲之範，又無編年之書爲之引導，似爲特別之作，其書與明史頗多異同，各篇之末，附以論議，文放晉書，體規張溥，（張溥有通鑑紀事本末等論）多儉偶之詞，遺詞隸事，曲折詳盡。或謂此書實成於歐陽，其論實成於陸圻，（姚際恆語）。又鄭元慶述朱彝尊言「此書德清、侍郎俾所著，爲諸生時，爲谷所譏拔，以此報之。」四庫全書提要則謂「邵廷采遺民傳稱山陰張岱嘗輯明一代遺書爲石匱藏書，應泰作紀事本末，以五百金購諸書，慨然予之。（希廬案石匱藏書二百二十一卷此書體例倣史記，余讀其稿本）谷爲浙學使，書成於浙人，谷以金購得之，此姑不具論，第論其書必有憑藉，可斷言也。其時浙江撰明史者，黃宗羲有史案紀略有國權，張岱有石匱藏書皆綜述有明一代史事，他若鄭曉之吾學編，朱國禎之史概，亦皆先後記述，况浙人之外，著述何多，紀傳編年，各有其書，蓋紀本末一

證，若無他證以爲之前驅先導，必不能發生也。

有以紀事本末施之古史者，宋章冲有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五卷，書太簡略，未嘗傳稱於世。清高士奇乃著左傳紀事本末五十三卷，其書以國爲經，以時爲緯，雖以左傳爲主，然亦別采經史諸子，爲之補逸，爲之考異，爲之辨誤，爲之考證，篇末各附以論，此其勝於章書者也。先是明沈朝陽有通鑑紀事本末則編，其書始於盤古，終於周分東西，荒誕不經之說，累牘連篇，故不足傳云。

有以紀事本末體施之偏方之史者，清楊陸榮有三藩紀事本末二十二卷，其書成於康熙五十六年，時溫審陳之南疆逸史，邵廷采之東南紀事，西南紀事等亦先後出，而傳鈔未廣，楊氏亦未必見也。張鑑西夏紀事本末三十六卷，其書有表有圖，（首列年表職方表及西夏優塞地圖。）蓋倣馬竊繹史例，至是而紀事本末一體又稍進化矣。且西夏史事，成專書者甚夥，洪亮吉西夏圖志十六卷，未刊行於世，張氏亦未必見。然則楊張二氏之紀事本末，其成書蓋有獨難者也。清乾隆時，薛瑩李有棠撰遼史紀事本末四十卷，金史紀事本末五十

二卷 其文與本、見八卷，但與他史、其修記事之異同有詳、者，並被裴松之註三國志胡三省注通鑑別小注、行、等、作、下、名曰、自著、自註、此又紀事本末之一特點也。前初尾續撰輯史一百六十卷，起自上古，迄於三代，亦爲紀事本末也。博采羣書，貫穿各事，事攬其要，略其始末，且又有政典、有學案，有世表，有輿圖，體大而思精，在是事本末中、可謂獨創而進化、足、自成一家者也，雖其中偶有誤緯，無餘並陳，不能鑒別，亦其一弊，然其規模宏遠，在斯讀中固莫之、京者矣。

吾國史書，雖以紀事本末爲好進化之體，然尚不知因果之規律，社會之要素，故其取材少客觀之精疑，敘事少主觀之斟酌，輕重詳略，多失其宜。此則改良史學，在乎後起之漢，不可以師資先賢也。

附錄

十一、太史公解

司馬遷史記，本名太史公。太史公自序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此還自題「書名曰大史公也」。自漢以來，頗多並用此名者，今略舉其例於下：

一、漢書楊惲傳，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爲春秋，名顯朝廷，擢爲左曹。霍氏謀反，惲先聞知。（考霍氏謀反，在宣帝地節四年，距惲始讀大史記已遠，蓋在昭帝時，其容稍出也。）

二、漢書宣元六王傳·思王字，元帝崩後三歲，天子昭復前所創監如故。後年來朝，（案在成帝建始四年）上書求諸子及大史公書。

三、漢書錢傳云，班固傳學，與劉向校書，上得其館，賜以成書之副。（案亦在成帝時）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及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自不許。

四、史記蕭策傳，謂王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沿春秋，以高帝爲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

五、漢書藝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讀太史公七篇。（藝文志本劉歆七篇，亦出於西漢）。

此西漢人皆稱史記爲太史公也。

六、後漢書班彪傳，其略論曰，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案此傳引彪語。稱太史公書，若上文敘事，則云司馬遷著史記云云，乃范曄之文，是宋時亦已稱史記矣。）

七、吳韋昭云，馮商受詔讀大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見漢書藝文志注引）

八、文選魏都賦張湛注，引太史公書曰敬仲世家。（案敬哲人。胡氏仿宋本文選注，作太史書曰曰敬仲世家。胡氏考異，謂書上當有公字，下當有曰字，各本皆誤，以此推之，疑凡此注，皆稱太史公，今多失其舊。案今本載注，除此處外，亦有

稱史記者，故胡云然。）

九、史記孝武本紀索隱引韋茂云，（案校，梁時人。）褚先生傳 褚先生，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爲博士，讀太史公書。

此則自東漢魏晉以迄於梁，亦尙有稱太史公者。

史記之稱，猶今言歷史，實爲史書通名，非爲遷書專名。太史公六國表序云：「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種甚。」又云，「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又自序云，「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此其證也。而大史公書之改稱史記，蓋起于三國時，魏志王肅傳，「明帝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又吳章昭亦稱史記見下引）是也。隋書經籍志以下於尊稱史記矣。然太史公書，可稱史記，則自漢書以迄清史，何嘗不可稱史記乎！故欲正其名，當仍稱太史公書。

然大史公定爲書名，實屬費解，前賢稱此名稱者，約有四說，皆不可通，今列於下，

且加駁辭焉。

一、謂太史公乃漢武帝所置之官名。

甲、史記自序集解如淳注引漢儀注云，「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

上太史公，副上丞相。遷死後，官帝以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

乙、漢書司馬遷傳注引漢儀云，「太史公，秩二千石，卒史皆秩百石。」

丙、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吳喜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非獨遷也。」（自序正義

亦引此說，稱吳喜志林。）

丁、史記孝武本紀張隱引志林云，「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獨居公上，

尊天之道，其官屬仍舊名，尊而稱之曰公，公名當起於此」。

案漢書百官公卿表，奉常，秦官，景帝中六年更名曰太常，以官有大史令丞。漢書藝文志，博學七章者，秦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則太史令亦秦官。漢書律曆志，有太史丞鄧平。太史公自序，亦言賦卒三歲，（賦卒在元封元年，卒三歲爲元封三年，）而遷爲大史

令。集解臣譚引茂陵中書云，司馬談以太史丞爲太史令。是武帝未嘗設太史公也。漢書律曆志，元鳳三年，太史令張壽王上書，元鳳爲昭帝年號，在宣帝前，則漢儀注謂宣帝以官爲令，亦妄說也。俞正燮癸巳類稿太史公釋名云，「周官，太史，下大夫。」左傳云，日官居卿以底日。周官註云，太史，日官也。左傳注云，日官不在六官之列，而位從卿，不得謂古者皆上公也。希祖案位，是也，然司馬遷傳云，向官屬下大夫之列，臣瓚云，太史令，秩千石，豈比下大夫。夫既稱下大夫，則非上公，秩千石，則非二千石。然則漢儀注漢書儀及漢志林之說，皆不足據，而太史公爲武帝所設官名之說，亦不能成立矣。

二、譚還自尊其父著述，故稱太史公。

甲、太史公自序，誤爲太史公。案曰云，「公著，遷所著書，尊其父云公也。」又爲太史公書序。案曰云，「蓋還自尊其父著述，稱曰公。」

案前本紀案曰云，太史公，司馬遷自稱也，自漢傳云，太史公曰，先人有言，又云太史公曰，余聞之遊士，又云，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明太史公司馬遷自稱也。希祖

案證此說，與自序索隱云云，實自相矛盾，此則自注一書，隨文泛說，前後不能畫一之弊也。然自序云，誤爲太史公，又云，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又云，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此則稱說爲太史公也。總之太史公一名，既以稱其父，又以自稱，又以名齊，非尊尊其父也。

乙、文選司馬子長傳任少卿書云「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李善注云，「太史公，遷父諡也。走猶僕也，言已爲太史公牛馬之僕，自謙之辭也。」

案李善亦以太史公爲稱司馬諡，考諡卒於武帝元封元年，報任少卿書，在道李陵禍之後，卽在武帝天漢三年以後，時諡卒已久，何得云爲其父諡？牛馬走之僕。且報任少卿書，何預於乎？俞正燮謂「太史公者，累官。牛馬走司馬遷者，猶秦刻石旣云丞相父云臣斯。」則以太史公爲遷自稱，視李善較可通。錢大昕亦云，鄭明奏記賈誼之，自稱下走，應劭曰，下走，僕也，師古曰，下走者，自謙，言趨走之役也，司馬遷與任安書，稱太史公牛馬走，牛馬走，卽下走也，上稱官名，下則自謙之詞。或解爲太史公之牛馬走，則迂而鑿矣。

與俞說相近。

三、遷葬公，爲卓、勰或楊惲所加。

甲、桓譚新論云，「太史公遷書成，示東方朔，朔爲平定，因署其下。」（史記孝武本紀索隱引）

乙、韋昭云，「說者以談爲太史公，失之矣。史記稱遷爲太史公者，是遷外孫楊惲所加。」（史記孝武本紀集解引）

丙、錢察云，「太史公者，皆朔所加，俾惲稱之耳。」

案桓譚，西漢末年人，韋昭，三國時吳人，去司馬遷尙近，其說宜可信。桓譚新論，今殘已亡，然陳姚察尙見其書，僞云太史公遺書成，示東方朔，朔爲平定，因署其下，此蓋傳聞之辭，未有地書可以佐證。漢書司馬遷傳云，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韋昭之說，蓋本夫此。蓋桓譚二公，以太史公既非官名，又非其辭司馬遷，而遷又不可自稱爲公，故有東方朔楊惲所加之說。然觀遷自序云，

爲太史公書序，則似非他人所加也。且報任少卿書，稱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此書不在史記之內，又豈爲東方朔楊惲所加乎。元太史公一書，不特每篇之末皆稱太史公曰，且各篇之中亦多有之，東方朔惲處處改題，何如是不厭煩乎。且未題公之前，原稱爲何名乎。稱太史乎。則令與丞官可稱入史也。稱太史令乎，則去令加公，與太史丞作仍不能分別也。此皆可疑者也。或曰，漢桓寬鹽鐵論，成於昭帝始元六年，已引可陽蓬貨殖傳語，稱司馬子言，「天下積穰，皆爲利往。」（見鹽鐵論毀學篇）據此，則昭帝六年，尙無太史公書名。遷自序稱武帝本紀爲今上本紀，則遷之卒，蓋在武帝末年，是大史公書名，非遷自己題署，而爲東方朔或楊惲所加，其說較是。余謂不然，鹽鐵論引遷之語，故稱司馬子以明言實攸歸，若今之引書，必曰太史公貨殖傳鹽鐵論既不稱太史公，又不稱貨殖傳，但舉作者之姓，而加一子字以叶稱之，正猶管子晏子，舉其姓而人皆知之。若謂其時無太史公書名，豈其時亦無貨殖列傳姓名乎。貨殖傳篇首引老子曰，久矣之以太史公曰，是當時明明有太史公名顯矣。引書之例，首言姓人，司馬遷之得名，何以太史公

齊，故不舉齊名，人亦必列之也。

四、書名本題太史公，稱公者，猶古人著書稱子。

甲、俞正燮癸巳類稿太史公釋名云，「史記本名太史公書，題太史以見職守，而復題

曰公，古人著書稱子，漢時稱生稱公，生者伏生，公者，毛公，故以公名書。」

案此說亦似是而非，古代子書，皆其弟子或諸注其人者所記，如管子墨子是也。或雖自著書，而其書名則爲後人所題署，如孫卿子韓非子是也。從未有自稱爲子者。子與公本皆爲五等封爵之一，至春秋時雖非封爵，而曾爲大夫者，亦得稱子，或稱夫子如論語稱孔子爲子或爲夫子，而冉有季路之稱季氏，亦曰夫子，以皆爲大夫也。其後則遂爲尊稱，雖非爲大夫，亦稱子稱夫子矣，如老子莊子及莊夫子賈（見漢書藝文志）是也。稱公亦然，其初非二公不得稱公，其後遂爲尊稱，如南公黃公（見漢書藝文志，陽家名家）是。先生之稱，本加於父，論語，先生譔，曾是以爲孝乎，可證也。其後則遂爲尊稱，如伯象先生（見漢書藝文志經家）是也。或稱稱，生爲生。成公生方稱生（見漢書藝文志陰陽家名家）是

也。凡稱子稱天子稱公稱先生，大都爲後人編輯時尊稱，非妄自尊大而自題其名云爾。俞氏以申公毛公稱太史公，不知申公毛公，雖皆治詩，然非魯名，所謂擬不於倫矣。况申公毛公，亦公弟子所尊稱，而太史公及後所自題，此又不可通者也。

余謂書名稱公，周漢之間，其例已多，今將見於漢書藝文志者列舉如下

杜文公五篇，陰陽家。原注云，六國時。師古曰，韓人也。

南公三十一篇，陰陽家。原注云，六國時。

毛公，篇，名家。原注云，趙人，與公孫祖等並游平原君趙勝家。

黃公四篇，名家。原注云，名疵，爲秦博士。

蔡公二篇，六藝易傳。原注云，衛人，事周王孫。希祖案此係漢人。

此五家之書，所以稱公者，皆非三公，而爲世俗之尊稱。故書名稱公，本非有所僭越，正如俞氏所謂猶古人稱子也。特是五家者皆非自稱爲公，必其弟子，或尊崇其學者所題署，此與太史公出於自題者爲異耳。且公之上，皆冠以姓，宋俗既稱其官，又加尊稱以

子或公也。然觀漢書藝文志，亦有此例，如

問尹子九篇。道家 原注，名喜，爲關吏，老子之關，各去吏而從之。

齊史子五十七篇。小說家。原注，古史官記事也。王應麟曰「風俗通引齊史子書，大戴禮 傳爲齊史氏之記曰百者胎教」云云。希祖案大戴禮稱齊史氏，猶後世之稱太史氏；三國時有太史慈是也。

「尹」言史，皆官名，子，爲尊稱，此與太史公此例最爲密合。然今本關尹子爲依託之書，齊史子之書已亡，無由知其爲他人之尊稱，抑爲自己之尊稱。若太史公者，實爲是日已加署，則官名之說，似不可通。惟此官名，乃從楚制之別名，非漢官之正名。同馬融自敘其官，則僅稱大史，蓋比附周之太史而云然，自序云，「太史公執邊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故復爲大史，則糾吾亂矣」，又曰「余爲大史而弗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之」，一說之稱太史，亦非虛官，漢官無專稱太史者。惟遷徙楚制，猶太史令爲太史公，祇以稱其父，又以自稱，且以稱其官，而稱爲少卿魯之太史公，亦可適切而解矣。

自春秋時楚國昭令，或稱王公（左莊十一年傳，楚王昭請保王公，皆隨葬人，此有注），楚昭大夫皆稱公（不得楚自楚公析公申公昭公，公曰公而公期思公，呂氏在左是也）卑梁公，戰門策之，是公行稱公，惟昭子北公，公，（止，止之昭公也，是昭昭王，其子昭大夫皆稱公，）此皆稱公稱公之證也。漢口祖本楚人，皆楚昭昭王，及昭昭之國，亦有稱是稱者，史記高祖本紀，沛父老字子，其昭令，立字（昭昭字季）為昭公。（此辭引漢書之口，何謂昭王，其昭昭公，昭昭昭王，昭公昭昭昭，故從楚昭昭曰公。）不待證也，史記孝文本紀，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又云，太倉公與男，有女五人，又云，太倉公身行，其少女紀終上書，文帝為除肉刑。太倉令可稱太倉公，則太史公何不可稱為太史公乎。（四炎武日知錄卷二十，以太倉令淳于公，因失名而稱公，太史公以司馬遷稱其父談為公，其說皆非是。司馬自稱亦曰太史公。太倉淳于公，名意，史記扁鵲倉公列傳，太倉公者，齊太倉長一策即太倉令，齊、燕昭昭長，故太倉令亦正稱為太倉長也，）昭昭人也，姓于淳氏，名。少而與昭，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

當傳，西之長安，實有王玄，於其少女絕縈上宮。上悲之，除肉刑法。據此，太倉公自有名，何得云失名曰釋公也。）

太倉公可以名傳，則太史公何不可以名書乎。其稱周勃君公列傳中，則稱太倉公爲倉公，猶簡釋太史公、史公也，列傳中則初全仙爲太倉公。逸既從楚俗，稱太史公爲太史公，則太史公仍爲官名，惟乃太史公之別名耳，豈似他人之尊稱，而得自己爲題署，與大史公不絕無所分別。而執其身受之官職，則仍從官之正名，自序所謂三歲而遷爲太史公是也。

雖然，此等稱謂，若不知當時之風俗，究嫌目怪，且屬駭俗。淳于公有名而不稱，又舍太倉公之正名，而用太倉公之別名，且以名其傳，然在書中，人亦未嘗措意。而太史公乃名其全書，令人好解，越數千年而紛紛揣測，莫能定其是非。漢桓寬改稱爲司馬子。殆亦不慊於其也。

二、漢十二世著紀考

上篇

唐顏師古漢書藝文志注言：「漢著記者今之起」注，「朱王應麟玉海曰：「漢著記即漢之起居注」，然則漢十二世著紀，殆即漢十二代之起居注乎？是起居注之最古者，不可以不攷。

漢書五行志，凡漢著紀，十二世，二百一十二年，藝文志，漢著紀百九十卷，藝文志之漢著記，蓋即爲五行志之漢著紀，紀記晉同，古書通用，律曆志：光武皇帝著紀，後漢書馬嚴傳，作建武注記，可證著注亦晉同，古書通用，凡漢書皆作著，後漢書皆作注，如漢書律曆志，五行志之著紀，藝文，谷永傳之著紀，後漢書和熹皇后紀，則作注紀，馬嚴傳則作注記可證，然則著紀即著記，亦即注記，明矣。

漢著紀百九十卷，蓋爲編年體，故藝文志於漢著記前列太古以來年紀二篇，後列漢大年紀五篇，可證也，律曆志引漢著紀，皆有年數，如：

漢高祖皇帝著紀，高帝卽位十一年。

惠帝著紀，卽位七年。

高帝著紀，卽位八年。

文帝著紀，卽位二十三年。

景帝著紀，卽位十六年。

武帝著紀，卽位五十四年。

昭帝著紀，卽位十三年。

宣帝著紀，卽位二十五年。

元帝著紀，卽位十六年。

成帝著紀，卽位二十六年。

哀帝著紀，卽位六年。

平帝著紀，卽位五年。

上引著紀十二世，二百一十一年，與漢書本紀十二世年數相同，五行志作二百一十二

年，蓋誤增一年，此偶爾出入，無損大體，而漢著紀之爲編年體，則更彰彰明甚矣。

近代起居注，皆爲編年體，著紀既爲兩年體，則與近代起居注無異，證之兩漢書，其事更明，後漢書皇后紀，劉毅曰：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漢之舊典，世有止置，漢書谷永傳曰：八世著紀，五行志言：十二世著紀，律曆志則十二世之外，又增揣了著紀，新都侯王非居攝三年，又十莽居攝，益竊帝位，號曰新室著紀，蓋位十四年，更始帝著紀，卽位二年，光武皇帝著紀，卽位三十三年，成帝時上封事所見著紀，自高祖至元帝，凡八代，故曰八世著紀，五行志之漢十二著紀，及律曆志所引漢十二世著紀，皆卽藝文志之漢著紀，有文志本於劉歆七略，律曆志本於劉歆三統譜，劉歆在王莽篡位後爲臣歸，其所見著紀至哀帝止，凡十二世，律志稿子至光武皇帝著紀，蓋爲班固所增，後漢書馬援傳，顯宗召見馬援，留與校書郎杜林同臥，親定建武注記，此爲光武年號，以光武皇帝著紀，且爲班固等所定矣。夫著紀既非一時一人所成，世世相承，各有注紀，則所謂古所謂若今之起居注，王應麟所謂卽漢之起居注，似斷然可信矣。

下篇

或曰：漢書紀非起居住，西漢自有起居注，隋書經籍志謂：漢武有禁中起居注。此其證也，案漢武禁中起居注，係稱書，余別有漢起居注考，茲不具論。

或曰：藝文志之漢書紀，與律曆志五行志之著紀，決非一書，著紀云者，著錄於本紀之謂，蓋卽指史記漢書之本紀而言，余謂不然，漢書律曆志，世評之例，春秋時則引春秋；戰國時則引得世終；秦昭王二世皇帝，則引秦本紀，漢則引漢書紀，著紀與本紀對立，其非本紀明甚，五行志谷永傳，著紀皆與春秋對立，則著紀自有一書，其非著錄於本紀之謂，又明矣。

五行志之十二世著紀，卽藝文志之漢書紀自九十卷，蓋詳載錄，惟著紀卽起居注，余亦尚有疑焉，隋書經籍志天文類，太史注記六卷，唐書：志大中氣紀自魏時代史官注配合周曆日本史官侯得考漢元光以奉史官注記，日食有加時者，三十七事，唐弘治古今江記序圖注記之書自欽天授時之制，其有什亦云：天人之理，所由參酌矣，故唐新歷

冰，非一時也，仲尼之辭，非一朝也，且日食行事，或利或曠，一年二交，非其常也，洪範傳云：六沴作見者是王躬未見之氣開焉耳，宜修其方，而先王之禮係草創設，宅以降必齊靈物爲備故也，太史上事係陰陽，勿疑可也，（申陸時專篇）按此，則太史注記，間有記天人相應之事者，永史爲天官，若專記天變，則入天文類，漢著記蓋亦太史所著，兼記天人相應之事，故卷數繁多，而入於春秋類，茲將五行志所引漢十二世著記，與夫漢書十二世本紀對照，則知著記與本紀，體例大不相同。

漢書本紀

高帝三年冬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

漢書本紀

高帝三年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在斗二十度，燕地也，（和）二年，燕王臧荼反，誅，立盧綰爲燕王，後又反敗，（漢書五行引漢書紀，下同）云

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在虛三

九年夏六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惠帝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夏五月，丁卯，日有食之，既。

度，齊地也；後二年，齊王韓信徙爲楚王，明年，廢爲列侯，後又反誅。

九年六月，乙未，晦，日有食之，既，在服十三度。

惠帝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在爲十三度，谷永以爲歲首正月朔日，是爲三朝，尊者忌之。

五月，丁卯，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幾盡，在七星初，劉向以爲五月徵修始起。而犯氐陽，其占重逆，其八月，宮車晏駕，有呂氏詐置嗣君之害，京房易傳曰：凡日食不以晦朔者，名曰薄，人君殊將不以理。

臣將暴起 日月不同 宿陰氣盛，薄日光也。

高后二年，夏六月，丙戌晦，日有食之。
七年，春正月，己丑晦，日有食之，
既。

高后二年，月，丙戌 晦，日有食之。
七年正月，己丑，晦，日有食之。既在
營室九度，爲宮室中，時高后惡之曰：此爲
我也，明年應。

文帝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
之。

文帝二年，十一月 癸卯 晦 日有食
之。在婺女一度。

三年十月，丁酉，晦 日有食之。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在斗
二十三度。

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丁卯 晦 日有食之。在虛八
度。

後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

後七年，正月，無。

景帝三年，二月，壬子晦，日有食之。

四年十月，戊戌晦，日有食之。

七年冬十一月，庚寅晦，日有食之。

中元年十二月，無。

中二年九月，甲戌晦，日有食之。

中三年九月，戊戌晦，日有食之。

後四年，夏四月，丙辰，晦，日有食之。在東井十三度。

後七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景帝三年，二月，壬午，晦，日有食之。在胃二度。

四年十月，無。

七年十一月，庚寅晦，日有食之。在虛九度。

中元年十二月，甲寅晦，日有食之。

中二年九月，甲戌晦，日有食之。

中三年九月，戊戌晦，日有食之。在
虛，在尾九度。

中四年十月，戊午，日有食之。

中六年秋七月，辛亥晦，日有食之。

後元年秋七月 乙巳晦，日有食之。

武帝建元二年二月，丙戌朔，日有食

之。

三年九月，丙子晦，日有食之。

五年春正月，無。

元光元年二月，無。

中四年十月，無。

中六年七月，辛亥晦，日有食之。在軫

七度。

後元年七月，丁巳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在翼十七度。

武帝建元二年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在奎十四度。劉向以爲奎爲卑賤婦人，後有街皇后自至微與，卒有不終之害。

三年九月，丙子晦，日有食之，在尾二度。

五年正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元光元年二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七月癸未，日有食之。

元朔二年三月 乙亥晦 日有食之。

六年十一月，無。

元狩元年五月乙巳晦，日有食之。

附錄

七月癸未，先晦一日，日有食之。荏弱八度。劉向以爲河年高國便殿災，與春秋卿隲災後日食於製軫同，其占，內有女變，外爲諸侯，其後陳皇后廢，江都，淮南，衡山王，謀反誅。日中時，食，從東北，過半暈時，復。

元朔二年二月，乙巳晦，日有食之。在胃三度。

六年十一月，癸丑晦，日有食之。

元狩元年五月，乙巳晦，日有食之。在柳六度，京房易得推以爲，是時日食，從旁右，法曰日失臣，明年，丞相公孫弘薨。日

元熙五年夏四月，丁丑晦，日有食之。

食：旁左者，亦君失臣，從上者，臣失君，從下者，君失民。

元封四年六月，無。

元熙五年四月，丁丑晦，日有食之。在貞井二十三度。

太始元年正月，無。

元封四年六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太始元年正月，乙巳晦，日有食之。

四年冬十月，甲寅晦，日有食之。

四年十月，甲寅晦，日有食之。在斗十九度。

征和四年八月，辛酉晦，日有食之。

九度。

征和四年八月，辛酉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在亢二度，晦時，食從西北，日下

時，復。

昭帝始元三年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

昭帝始元三年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

元鳳元年秋七月，己亥晦，日有食之。

之。

宣帝地節元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

五鳳元年十二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四年夏四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元帝永光二年三月，壬戌朔，日有食

之。在斗九度。輿地也，後四年，燕刺王辟反錄。

元鳳元年七月，己亥晦，日有食之。歲在張十二度。劉向以爲己亥而既，其占宜，後六年，宮車晏駕，卒以亡國。

宣帝地節元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在營室十五度。

五鳳元年十二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在婺女十度。

四年四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在畢十九度，是爲正月朔以未作，左氏以爲要異。

元帝永光二年三月，壬戌朔，日有食

之。

四年夏六月，戊寅晦，日有食之。

建昭五年夏六月，壬申晦，日有食之。

成帝建始三年冬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夜，地大震未央宮殿中。

之，在廿八度。

四年六月，戊寅晦，日有食之，在張七度。

建昭五年六月，壬申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因入。

成帝建始三年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其夜，未央殿中，地震，谷永對曰：「日，姤女九度，占在皇后，地震瓊殿之內，咎在貴妾。二者俱發，明同事異人共捷，則陽將營繼問也。且日食，則妾不見，皇地震，則后不見。異日而發，以似殊事亡，故勸變，則恐不知。是月，后不當有失節之憂。故天

因此兩見其體，若曰遠失婚道，隔遠棄妻，妨絕繼嗣者，此二人也。杜欽對亦曰：日戊申食，時加未戌未土也，中宮之部，其夜，戰中地震，此必適妻將有爭鬪相害而爲患者。人事失于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司德，則咎異消，忽而不戒，則禍敗至，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

河平元年夏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

河平元年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不食鉤，在東井六度。劉向對曰：四月交于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東井，京師也。且既，其占恐害繼嗣，且蚤食時從西南起。

三年秋八月，乙卯降，日有食之。

四年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陽朔元年二月，丁未晦，日有食之。

永始元年九月，彗。

二年二月，乙酉晦，日有食之。

三年八月，乙卯降，日有食之，在房。

四年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在昴。

陽朔元年二月，丁未晦，日有食之。在

胃。

永始元年九月，丁巳降，日有食之。谷

永以京房易占，對曰：元年九月日食，酒亡節之所致也。獨使京師知之，四國不見者，若曰湛溺于酒，君臣不別，禍在內也。

二年二月，乙酉晦，日有食之，谷永以

京房易占，對曰：今年二月日食，以飲不得度，民愁怨之所致也，所以使四方皆見，京師陰蔽者，若曰人君好治宮室，大營墳墓，賦

三年正月，己卯晦，日有食之。

四年秋七月，辛未晦，日有食之。

元延元年正月，己亥朔，日食之。

哀帝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二年夏四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平帝元始元年夏五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二年九月，戊申晦，日有食之。

凡漢書本紀十二世二百一十一年，日食

最甚重，而百姓屈竭，隳在外也。

三年正月，己卯晦，日有食之。

四年七月，辛未晦，日有食之。

元延元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哀帝元壽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在營室十度。與惠帝七年同日。

二年三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平帝元始元年五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在東井。

二年九月，戊申晦，日有食之，既。

凡漢書本紀十二世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

四十八，（漢著紀有而本紀無者，八。本紀有而漢著紀無者，二。）朔十晦三十五，不書朔晦三。

十三，朔十四，晦三十六，先晦一日三。（案今本五行心日食五十四 晦三十七，先晦一日三。）

上所引漢著紀，其書日食天數與其狀況，皆較漢藝文本紀爲詳，而引人事爲占驗。則天文家觀乎天文以察時變之正職。藝文志云：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太史爲天文專官，明天人相應之學，世世相傳。各有記載，皆詳察天象，默參人事，廣采衆說，以成一家之言，故凡京房，劉向，谷永，杜欽之說。隨世所見兼收並蓄，以充實其書，所謂太史注記，不外乎此。五行志所引漢著紀 正屬此類，（案五行志所引漢著紀，如高帝三年十月十一月，兩次日食所舉燕地齊地人事應驗，不獨舉名氏者，蓋係太史所記，其他楊舉劍向谷永等說，或爲著紀所采，原文或係班固撰五行志時所加，則不能別矣）。惟專采日食一端，其他天變人事，交相附會，著紀所缺，必尙繁多，谷永言建始元年以來二十歲間羣災大異交錯錄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紀。（漢書谷

永傳一可見著記所包，尙有其他羣異大異。舉凡漢書五行志之所陳，及律曆志天文志之所載，凡屬太史之所觀察占驗，莫不分別年月詳爲著記，故著記一書，爲天人相應之史。決非起居注專詳人事可比。劉歆以漢著記列於春秋系，正猶以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雜災異三十五篇列於易家，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許商五行傳記一篇列於尚書家，蓋漢之儒者，最重天人相應之學也。

劉歆著七略及三統曆譜所見漢著記百九十卷，以藝文志之備言之，此百九十卷，既非班固所人，尙沿七略舊文，當然僅有十二世，而律曆志則雖本三統曆譜，然自孺子以至光武著紀，顯爲班固所增入，而光武注記，且爲馬融杜撫班固等集定，則十二世著記，亦必世有參定之人，故於太史所記之外，間有儒家天人相應之學能參錯乎其中，此亦勢所必至者也。

咸又曰，顏師古注漢書著記若今之起居注，疑師古視見其書，否則師古何以漫相比擬，觀師古所注，有引漢江二事，疑漢江卽漢著紀，茲列其證如下

宣帝紀 黃龍元年，師古曰：漢注云此年二月，黃龍見廣漢郡，故改年。

平帝紀：冬十二月丙午，帝崩於未央宮，師古曰：漢注云帝春秋益壯，以母衛太后故怒不悅，莽自知益疎，竊弑之，諫由是生，因到臘日，上椒酒蜜藥酒中，故霍廢移守云：莽鴆殺孝平皇帝。

漢注一書不特師古見之，晉臣瓚晉灼等注漢書亦已引及。

高后紀：立孝惠後宮子張爲淮陽王，晉灼曰漢注名長兒寬傳輔廷尉文學卒 史臣瓚曰：漢注卒史秩六百石。

漢注疑爲漢注記之省文，注記卽著記，師古親見其書，故得以今之起居注相比擬，不得以後世太史注記偏言天文以察時變而疑其非起居注也。今謂師古以起居注比擬漢書記者，蓋以劉毅言漢之舊典世有注記而馬嚴班固等纂定建武注記，其後明帝靈帝等，各有起居注，遂以爲注記，卽起居注，故解著記，亦以此比擬耳。至於漢注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皆無其書，若卽爲漢書記，師古何以不稱人所習見尊說之名，而反省觀其名爲漢

注，恐無此理，竊謂漢注一書，蓋爲漢書舊注。漢服制風俗通義聲義篇，引漢書舊注云：衣吹襪也，振者振也，言其節儉威儀。又荻簞也，言其聲音荻荻名自定也。又省稱漢舊注，史記高祖本紀，其以沛公除暴沛邑集解引風俗通義曰：漢舊注：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音也。高祖始登位敕令言：其後以爲常耳。晉灼臣瓚及師古所引漢注，蓋爲舊漢注之省稱。其文皆爲注釋體制，似非史文，卽或爲史，蓋亦爲後漢或魏晉人所作，屬於雜史，與漢伏無忌古今注同類。後漢書伏湛傳：子無忌采古今刪著事要，號曰伏侯注，章懷注云：其書，上自黃帝，下盡漢質帝，清馬國翰輯其佚文謂其書多言符璽災異，漢注一書蓋與此同，則傳與漢著記言災異者相近，決非起居注所得比擬也。續漢書百官志：太史令掌天時星辰，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則著記一書，於災異外又必記有瑞應之事，與古今注同，而太史掌記，又得一別證矣。

重慶市圖書館藏書處審查證安圖字第八號

| 版權所有 | | | | |
|------------|----------|-----------|----------------------|--|
| 中國史學通論 | 著者 朱 希 祖 | 校對者 施 方 生 | 行印者 獨立出版社 重慶香園寺上首 | 經售處 正中書局 重慶中一路二一〇號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磁器街二十二號 |
| 民國三十二年四月初版 | | | | |
| 元 四 十 價 頁 | | | | |